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3年)

## 目录

钓鱼岛问题：回应迷思中的国际主义左派 .....	2
就朝鲜问题接受瑞典记者采访 .....	46
上天入地，尽在习总书记一念之间 .....	51
海内外各界人士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反对铁路私有化 .....	55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铁路私有化 .....	68
专访反对撤销铁道部联名公开信的发起人 .....	70
历史将宣判薄熙来无罪 .....	76
左派力量到底有多大 .....	78
薄熙来与中国人民的最低共同纲领 .....	84
与红二代“拭目以待”谈“江山” .....	88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能存活多久 .....	90
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	108

钓鱼岛问题：回应迷思中的国际主义左派  
——东亚民族的历史伤口、现实的资本主义冲突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陈墨（2013年1月4日）



远航一号原编注：这是一篇难得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正确地分析钓鱼岛问题及其对阶级斗争影响的文章。作者陈墨同志虽然是从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出发，但是其在本文中所运用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我们与陈墨同志的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是 **90%** 以上是共同的。我个人尤其要感谢赤旗同志将这篇文章提供给红色中国网。我们也衷心欢迎赤旗同志、陈墨同志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给予批评。

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那

陈墨初稿， 梁文道修订

从今年 8 月中旬起，中国、日本和台湾三方在钓鱼岛控制权与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历时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见缓解，而相反军事对峙的局势有增无减。

统治阶级方面，日本右翼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极右翼势力频频挑衅，日美军事演习频频，中共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则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以近数十年来少见的强硬方式进行回应，台湾资产阶级朝野两党也采取种种手法声张台湾在钓鱼岛（钓鱼台）的主权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近两百座城市发生上百万民众卷入的长达月余的群众性反日游行和部分骚乱，在香港和台湾乃至海外诸多地区也发生近年少见的华人保钓反日游行。而日本国内，尤其是在冲绳地区，日本进步民众反对美军驻扎和日本当局的军事化斗争正方兴未艾。

近来围绕钓鱼岛发生的冲突与对抗是东亚矛盾局势的综合表现。作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中国、日本、台湾和美国统治阶级间矛盾不断，冲突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诸国统治阶级间仍然存在诸多勾结与妥协，面对危机维持现行“稳定”秩序的基本目标仍未改变，迄今为止国际资本主义强权间仍然处在“斗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虑到整个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包括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前三强（美国、中国和日本），三个核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四大海军（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四大空军（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想

而知东亚地区发生的任何地缘冲突和阶级斗争都将对世界经济与安全局势产生巨大影响。

## 国际主义左派关于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反日游行的立场

针对这一严重影响东亚局势和各国民众意识的事件，国际主义左派自然也极为关注，纷纷发表评论和主张自己的立场。此处国际主义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义基本原则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括国际上一些比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也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的华人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关注一些国际主义左派组织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声明。

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国际主义左派（托洛茨基主义派）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志撰写的《中日岛屿冲突的背后？》（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简称《冲突》，<http://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该文不仅提及了中日钓鱼岛冲突本身，也涉及到相关群众运动和更大范围的东亚诸国（包括中、日、台、俄罗斯和韩国等）领土领海争端，以《钓鱼岛争端背后的帝国主义冲突》的中文译名发表在香港出版的第 18 期《社会主义者》杂志上）

2)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陈骏（Chan John）撰写的《反对中日民族主义》（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以下简称《反对》，<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s21.shtml>，事实上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还有数篇相关钓鱼岛冲突的文章，但由于该文以社论形式出现，且其他后续文章的立场基本相同，所以以该文为准

3) 第五国际/工人力量 (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 (Peter Main) 撰写的《中国：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义宣传的动员》 (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 ， 以下简称《动员》 ，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ina-beijing-has-demobilise-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 RCIT) 的迈克·普劳勃斯登 (Michael Pröbsting) 撰写的《不要中日帝国主义煽动的沙文主义战争！》 (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 ， 以下简称《不要》 ， <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于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写，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译件，所以为确保尽可能忠实于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时，将直接引述和翻译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内容有所不同的，将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说明）。

几家国际主义左派虽然具体分析和立场略有不同，但在主张立场和诉求时容易将完全抽象的原则和理论简单地套用到复杂的现实事件，无视社会条件、客观环境和群众觉悟，陷入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迷思之中。由于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赖片面的和不完整的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信息和资料（尤其是英文资料），而这些资料和信息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先验性和选择性地挑选与过滤的结果，更往往导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现西方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

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F. 恩格斯，1885.04.23, 书信《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国际主义左派在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反日群众运动虽然强调了国际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的宗旨下，但忘记去“了解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以欠缺从无产阶级立场的分析和对于未来革命的展望，在事实上也违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过渡纲领》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国、日本、台湾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局面。

## 被误读的中国反日群众运动

首先，国际主义左派在对钓鱼岛事件和相关的群众运动分析时，有意无意间将中国各地发生的自发的群众性反日运动等同于中共资本主义当局的官方宣传和军事主义煽动，将游行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口号和现象等同于群众正当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右翼扩张主义的情绪，将游行、示威乃至罢工的参与主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等同于富裕的亲资本的新兴中产阶级，将历史上的反殖民斗争和民族情绪等同于纯粹的钓鱼岛领土争端。由此得出中国民众自发性反日群众运动本身是反动的、负面的、沙文主义的和为统治阶级服务利用（不仅是中国统治阶级，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统治阶级）结论。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分析，“在评价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区分进步的特征和反动的特征。这些游行反映了当前群众意识的极度混乱。尽管游行吸引了许多反对中共统治的阶层，但是反日抗议游行把这些阶层引导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而且反日游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被当地统治阶级和美国所利用。特别是在日本，反日游行的发生不仅没有削弱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帮助他们。只有通过在日本、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工人阶级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

替代，才能打败各个国家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在未来可能准备以战争行为作赌博。”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强调，被中共大开绿灯的中国反日示威，也同样反动。主导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与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同时对中日两国工人阶级都存在深深的敌意。这反映在他们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础上去提升中国企业的地位。中国的示威活动中有一种公然的种族主义性质。许多横幅和标语谴责“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说那些针对在华日本国民的随机性袭击。最具挑衅性的是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的呼吁以及日本出现核蘑菇云的横幅。这些军国主义情绪是直接受到了中国的媒体评论员和军官们的鼓动。他们在电视上吹嘘说，如果战争爆发，中国可以发挥它的“杀手锏”，对日本发动核打击。这种野蛮的建议无异于引发一场全球性核冲突，因为这样的攻击马上就会牵动美国。

梅因的《动员》一文中描述为，这种广泛传播的是为无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导致了抗议者与警察间暴力冲突，并发声打砸抢日资商店和焚烧日本车的现象。而且很多标语在谴责日本入侵和收复中国钓鱼岛的主权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强硬态度和处置官员腐败。

普劳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写，在日本街头没有发现好战的群众示威气氛时，在中国则完全不同。一部分群众，其中许多人是青年，则充满反日情绪与中华沙文主义。根据报道，在全国至少 **108** 座城市发生示威，在许多城市这些示威转化为反日骚乱，例如深圳、广州、东莞、长沙、西安和青岛等地。根据报道，示威者的口号充满沙文主义，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制日货！”、“钓鱼岛属于中国！”、“对日宣战！”等等。大量的日本产汽车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烧，日本大使馆也成为抗议示威的目标。这导致例如丰田、本田、马自达、



佳能、松下和优衣库等暂时中止生产经营。根据香港报道，在北京街头张贴有招募“强奸日本女性”的海报。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绝不会否认过去 1 个多月的反日群众游行、运动、示威和罢工中存在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小部分群众中乃至有严重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但是，不能将意识混乱的部分群众右倾和错误的口号等同于游行群众的主体。现实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永远不可能存在于“意识真空”中，但这些反动的、消极的非主流因素并不应该构成我们判断整个群众运动的依据。事实上发生在全球各地诸多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中东群众发生的反美大游行，欧洲希腊和西班牙群众组织的反削支和反欧盟（以及反德）游行，乃至日本冲绳地区民众反对驻日美军运动，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少部分种族主义言行。

从 8 月 15 日港澳保钓船只登岛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抓捕到 9 月 24 日中国全国范围的反日游行基本趋于结束之间的一个多月时间，在中国近 200 座城市发生各种形式的反日游行、示威和罢工，上百万群众卷入其中，自发参与的主体是工人阶级、青年和中下阶层市民等，同时也必然有少部分中产阶级和极少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和官僚。参与的大部分群众虽然在政治意识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数人有强烈的反对专制当局和反对其资本主义政策的倾向，包括以毛派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亲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参与其中，但是后者的主体事实上是以反对这场群众运动为主。

在科洛的《冲突》和梅因的《动员》都有所提及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毛泽东画像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强调群众中举毛的画像是中共政权内部派系斗争，支持对日宣战和支持薄熙来，并且将之称为是中共政权内部拍戏策划的结果，却没有承认这种行为在民众中的基础和其自发性，更多的是基层群众对现在中共专制当局和其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中国毛派和泛左翼势力复苏远早于薄熙来机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地左转。早在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共政权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在前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也就是当局所称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就出现对于前计划经济毛时代的思念和对当局资本主义政策的抨击。在当时这股思潮集中于中老年，尤其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中，也出现了各地自发的群众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和唱讲革命歌曲行动。这些群众性自发的集会与悼念十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当局的镇压与打击，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却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媒体经常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蓄意歪曲报道。薄熙来在前几年推行的唱红讲传和打黑活动不过是对这些群众行为的东施效颦和迎合投机而已。不能将群众的自发运动与政客的投机行为混为一谈。相当一部分毛派活跃分子也承认，薄熙来搞的不过是资本主义改良行为。有资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确地说明，他投机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上层矛盾，重要的是不为其所用和发动群众。而且，即使在这些群众中存在各种混淆意识，譬如将现在的中共政权仍然视为“修正主义政权”，希望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左转”，但群众中反对现行资本主义政策是明确的，要求左倾的诉求是真诚的。

而且，很遗憾在国际主义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数参与游行示威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左倾劳动群众的主流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收复钓鱼岛”这两个口号，并非所谓仇恨日本民众的种族主义清洗口号。种族主义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狗”确实存在（如陈骏文章《反对》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现象，至于所谓鼓吹“中华帝国主义”和“强奸日本女性泄愤”的极右口号则更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现象（如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图片和视频为证，只要不带有偏见，就一定会承认主流口号并非是种族主义的。当中国广大群众主流仍然在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针对日本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时，假如不承认这一口号本身具有进步性，将群众

中朴素的义愤等同于支持“中国帝国主义”，这对群众运动本身是一种不公正的选择性的态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往往对中国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误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假如群众运动高举毛像，至少在言辞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认自己为左派和倾向社会主义，乃至明确支持马列主义（虽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义认同的）。而这种在理论上对于马列主义与阶级斗争的依赖，使其民族主义的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根据现实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主动强调民族主义，必然会对毛派本身的阶级理论进行修正，最后走向资本主义化。因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左倾群众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实也表现在右倾的社会力量中，甚至表现得更为反动。右翼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主要利用的对象，而非左翼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的汉服国学运动和儒教基督教主义者就是这种右翼民族主义力量的反映。他们并不需要高举毛像和唱红歌，而是身穿汉服和背诵四书五经，甚至信奉基督教，他们是更为明确的反动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与皇汉分子，而且在中国各民族内部进行挑拨分化，并进一步争取新兴中产阶级和工人上层。他们往往以明确的反共立场（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 1949 革命，乃至甚至倒退到反对一切革命），有些倾向于美国和国民党势力，有些则直接以德国纳粹为模板。

### 误入歧途的革命失败主义与国际主义左派

国际主义左派的文中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现政权已经是帝国主义政权，所以呼吁中国无产阶级和左派不要介入群众性反日游行和运动，在中日冲突上采取超脱和双重反对的立场。

如科洛同志在《冲突》的，中国的公司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建立起

来，中国帝国主义的出现已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事实，并且也反映在当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对日本的态度。

梅因在《动员》一文提及，在关于岛屿主权争论中，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争相控制本地区的资源。

在这一问题上，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CIT）的迈克·普劳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远，机械地照搬列宁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失败主义”（**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论。普劳勃斯登明确主张中国和日本无产阶级在未来发生的任何一种战争中都应该采革命失败主义，认为如此方有利于削弱本国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关于“革命失败主义”的说法恰恰反映了严重的机械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所谓的原则，而无视客观事实。事实上，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言，革命失败主义从来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原则，而只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时一地根据力量对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推行革命失败主义是因为以此来打击沙皇专制统治的力量，而且民众中有强烈的反战和平情绪。而一旦十月革命爆发，为了防御德军入侵革命中心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影响的部队可是立即进行革命防卫主义，而不是坐视德军进攻。此后，苏德的停战条约谈判中，也并没有为推行革命失败主义或者支持德国工人革命，而主动对德国帝国主义无条件让步，只是为了维护新的苏维埃政权生存而被迫让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在作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中国的老一代托派，还是在欧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数托派，面对本国政府与德国纳粹和日本军

国主义政府的战争，也都没有推行所谓的“革命失败主义”策略。在中国，托派组织甚至自组游击队，直接参与抵抗日军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数派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号召成员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与所有的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成为一个好士兵，呼吁由士兵委员会等民主控制军队，在军队中继续捍卫普通工人阶级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时任第四国际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人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后对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的声明：大多数美国民众积极或者消极地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战争计划。作为少数派，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派。我们不破坏战争或者反对军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民一起参与军队。我们服从多数派的决定。但我们保持我们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表达的权利。今天工国委（CWI）英国支部的前身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领导人已故的泰迪·格兰特（Ted Grant）当时也是积极支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为他们深知这是灵活利用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面向工人阶级的重要手段。

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间发生的战争上采取所谓“革命失败主义”的立场，难道一定会如普劳勃斯登所描述的带来更容易的改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和最终实现工人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吗？这个设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结论。

最近十年，美帝国主义野蛮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现实例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是个专制的军事强权，在美国支持下与伊朗发生战争，此后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是有着严重封建残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权。我们从不否认这两个政权的反动性，但是难道因此可

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面对美帝国主义入侵需要采取所谓的“革命失败主义”？

两国遭到美军入侵和占领后的现实是，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冲突不断，被各种专制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统治着，数十万平民遭到杀害，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严重缺乏，本地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敲骨吸髓地盘剥自然资源和奴役人民。萨达姆死了，换来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萨达姆，塔利班退入农村，却并没有被消灭，而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在经济上更腐败，在宗教上同样甚至更反动。这样的局面真的有利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本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吗？

如今中东战云密布，专制的政教合一政权伊朗也正面临美帝国主义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威胁。国际主义左派难道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伊朗的工人阶级也应该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的做法，反对本国专制神学统治阶级，帮助或者坐视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入侵吗？假如采取这样的策略，能真正有助与伊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行进步革命吗，有助于削弱世界范围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吗？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双重性和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精英的对外依附性意味着，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即使今天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垮台，没有足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出现的依附性政权或者数个政权，只会更加反动野蛮地镇压和分化工人阶级，而根本谈不上有利于削弱统治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反对“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无条件支持如今的资本主义当局，反对战争和反对军事扩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原则。

**两元性中国资本主义专制当局与群众性保钓反日运动**

中国自从 19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专制资本主义政权。毫无疑问，其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上升中的新兴帝国主义的特征，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资本输出，持有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巨额债务和外汇储备，在亚非拉等边缘经济体（新殖民世界）进行投资和大规模劳动力输出。

但同时，中国仍然尚具有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并控制关键产业，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享有特殊权益，大量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外国资本奴役和压榨。而日本资本更是从 1970 年代末起，就积极参与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经济剥削，而这种资本输入带来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特别是存有历史情结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交织在一起。

中国资本家对非洲的资本输出、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会引发非洲当地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中国资本和帝国主义不满，因而扩展为排华情绪。而这种针对中国人，而非资本的排华情绪可能会被非洲当地民族资本家乃至西方帝国主义利用，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洲本地工人阶级和民众反对中国资本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情绪就是不合理不正当的。同理，可以应用到中国工人阶级与日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外逃，以及资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国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扩张型的资本输出。事实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志曾经在其他文章引用过中国有 7 成左右千万富翁计划移民他国的数据，很多官员以转移个人资产和家属去他国为要务，而且他们所要移民的国家主要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绝大多数高层官员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国等欧美国家接受教育的背景。无论是已经下台的薄熙来、最近刚刚暴露腐败丑闻的总理温

家宝，乃至即将接掌大权的习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国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级官员前往哈佛大学等欧美精英学校接受培训，因此哈佛大学被称为“中共第二党校”。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的传说，如果中国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军甚至不需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只需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美国国内按图索冀，将官员家属子女与情妇扣押，将外逃的官员与资本家财产没收，中共政权就不战自败。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军事帝国主义日本、俄国和德国的上层统治阶级并没有在与美英法等国争夺霸权时集体移民去“敌国”的想法。

假如说中国资产阶级一面雄心勃勃地要与美日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控制权，一方面又要想尽方法携带资本成为这些“敌国”的公民，这本身不是显得自相矛盾吗？这种矛盾对于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常态。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单一的均质体，而是极端自我分裂的阶级，这种自我分裂甚至可以体现在资本家个体身上。而资产阶级内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有的半殖民地国家的买办倾向。这种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的内部分裂，也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虚弱性和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双重性。中共资本主义当局的这种双重性也反映在其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来中共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现强硬与扩张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对内剥削和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让的特征。事实上，在钓鱼岛和对日冲突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对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亲日政策，甚至同一个高层官员，在不同时间都可能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态度，如现任总理温家宝即是如此。他们对此问题的解读从来都从如何维持其统治的角度考虑，而并不是单极扩张与对抗思维。国际主义左派在分析中只考虑到中国政权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其向外国帝国主义投降退让，出卖民众利益的一面。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残留的前斯大林主义畸形工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征和



形式。作为一个执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制政党，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政制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治集团仍然宣传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政党”。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不会以这些意识形态为标准，这些宣传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广大民众。但既然如此，不就是恰恰证明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基层群众中仍然存在“对社会主义统治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进步性”的认可吗？否则当局何必要进行这种欺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志此前提出的反日运动中群众高举毛像不一定是倾向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假如没有群众这种自发反对和抵制，中国的统治精英与资产阶级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苏联和东欧一样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应该在明确反对中共资本主义政权和其资本主义政策同时，尽一切可能与劳动人民一起捍卫 1921 年到 1949 年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进步成果。

而且，我们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国主义国家，其国内任何有民族意识的民众运动都是反动的结论。与国际主义左派和中国的某些反民族主义左派机械化的设想不同，现实情况总是复杂的，对于个体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个体的群众运动，我们只有结合客观环境和实际力量对比进行个别分析，没有简单而划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今天的日本政权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资本主义属性、资本输出和军事扩张的程度上，与中国相比较也都算是“当之无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具体情况将在下文中关于日本的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其军事和外交仍然受制于美国，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实上的法外治权。在这种局势下，日本民众发动的反对美国驻军和美日安保条约的民族解放斗争能被界定为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吗？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众反对安保条约和反对美国驻军的运动，承认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无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正如托洛茨基在 1930 年“对印度支那反对派的宣言的评论”（1930 年 9 月 18 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是他们对压迫者，即外国帝国主义者，表示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无产阶级没有权利轻视这种民族主义。恰好相反，它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它是民族解放的最坚持、最忠诚的战士。”所以，重要的是民众参与的具体的民族运动本身的性质和参与其中的阶级构成，而并非是统治阶级政权的一般性质，否则显然就是堕入了将该国人民等同于该国统治阶级的陷阱之中。这既适用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驻军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 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和亲西方民主派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我们判断一场运动进步性为主，或者反动性为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构成。谁在支持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支持谁，谁在反对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反对谁？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将参与游行的主体归类为“富有的中产阶级（**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显然是一种误读。正如前面对中国现政权和资产阶级性质的分析，事实上中国真正倾向资本主义和所谓西方民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精英对于群众运动即使不怀有强烈的敌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强烈反对任何破坏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行为，并将任何涉及自发的有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群众运动攻击为“义和团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把参与其中的群众藐称为“愚民”或者“暴民”。

他们固然反对中共专制当局，但并不反对其执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而是认为远远不够，并要求当局切实执行亲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政策和尊重现行全球化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他们固然宣传要民主权利与自由，但事实上他们所要的是以私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众的民主与权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亿万富翁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强调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对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层应该有经济精英选举产生。而《08 宪章》联署人经济学家茅于軾则强调，“钓鱼岛是无人小岛，丢掉又与我何干”？如果是为了资源，应该由中日双方专家讨论共同开发实现“双赢”。所以，中国的主流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并不赞同与支持自发的群众运动，他们将钓鱼岛问题视为中日两国资产阶级之间就利益分配进行“协商”。

这也是中国亲西方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主流整体倾向。如在反日群众运动高涨期，一直倾向政改的《中国青年报》和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虽然韩并非正式的《人民日报》日本分社社长，但确实是《人民日报》在日本的总代理，而且她在国内从事官方活动或讲学时确实使用《人民日报》日本分社社长，显然得到官方的默许。）则一再宣传“保钓害国论”，认为香港民间保钓登岛是“害国行为”，而群众自发游行更是破坏社会秩序。倾向中产民主派的《南方报业》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报道，以及上海、广州等地网民在网络上的讨论，也纷纷指责各地参与游行的都是外地人和底层外来工人，他们甚至将参与游行的人员没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会说本地方言视为非本地人证据，以此证明大城市中多数保守的本地富有阶层并不屑于参加这种群众运动。游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坏发达城市的秩序”。

## 反日群众运动与无产阶级的愤怒与抗争

至于在示威和随后发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击性行为，与其说是明确的排日的种族主义攻击，不如说是在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底层群众愤怒发泄的一种扭曲反映。这与世界各地发生的底层民众骚乱非常类似，如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发生的以少数族群为主的各种骚乱，也和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发

生的骚乱型泄愤型的群体事件没有多大差别，譬如 2011 年在广东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发生的外来工人和小商贩群体与当地军警乃至本地居民发生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

而且，事实上中国近来发生的泄愤型群体事件和各地发生的针对城管和警察的群众骚乱中暴力程度要远远胜于反日游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范围远不可同日而语。反日游行中暴力行为的参与者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事实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职业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则是被煽动和迷茫的底层青年和劳动人民。一些中国自由主义右派在网络上盛传的所谓军警组织参与打砸的情况，往往已经被辟谣和查实自相矛盾。而从中共当局的角度出发，也不可能会去组织或者容忍这种危害其“自身稳定”的打砸，特别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车和防暴车辆。至于所谓左翼群众和毛派有组织打砸更是一种污蔑，事实上根据各方面消息有组织的左翼群众游行，其纪律相对更完善，而且口号也更理性，而不是强调种族主义和全面仇日的。同样部分毛派在网络上指参与打砸事件的是来自香港等地的民运分子，也没有确实的证据。

根据目前中共当局和媒体披露的被当局警方抓捕的参与示威打砸和骚乱人员的信息资料来看，也基本都是从偏远农村和小城镇来的外来工人为主。譬如在所有反日游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严重（在西安砸日系车与车主发生冲突，导致车主重伤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后抓获的嫌疑人是来自河南南阳农村 21 岁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学即已辍学。而在深圳披露与警方骚乱中打砸警方防暴车的也是来自河南农村从事保安行业的外来工人等。

日本的一些媒体也注意到在中国深圳、成都和苏州等地的抗日游行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是简单地对日本宣泄，而与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有直接关系。诸如日本大报《读卖新闻》文章《反日游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资的劳工》（8 月 22 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

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游行抗议者看似说湖南口音普通话的外来务工人员。日本料理店在中国通常是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进出的场所,这本身就成为底层民众仇恨的对象。

在日资企业投资密集和号称有亲日气氛的东部重要经济城市苏州,在这次反日游行中,数十家日资餐厅和酒吧被打砸,而参与打砸的主要也是外来工人和当地青年。其经济开发区“苏州新区”内有著名的“日本一条街”,街道上有上百家日式餐馆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饮、娱乐乃至色情服务,是当地投资的日本资本家、中国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应酬消遣的场所。其中一些服务场所甚至明确规定,无外籍人士参与,不接待普通中国人,往往一晚消费等于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收入。这些场所历来被当地底层民众和外来工人看做是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象征,在群众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并非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失控而引发骚乱中打砸烧汽车和高档场所并不是什么少数现象,亢奋而愤怒的群众没有组织的约束和纪律,必然会将愤怒以破坏性和反生产力的方式发泄出来。不仅游行与抗议如此,甚至在包括群众性的聚集,如露天音乐会和各种体育比赛的观众,都会引发类似情况。而在中共专制当局的专制控制下,群众往往缺乏游行与示威的经验,又加之不可能有组织规划,无专门的路线和维持秩序的纠察,所以更容易导致在示威和游行中一旦冲突发生出现失控局面。而由于游行和抗议活动的议题不同,自然也针对打砸的对象有所选择。亲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右派正在用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层劳动人民。

而且,国际主义左派的文章分析显然都没有提及值得注意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国日资企业工人罢工和他们的诉求。根据不完全统计,在9月反日运动中全国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厂近十万日资企业工人参与罢工。根据红色中国网、莱

莉花网站和自由亚洲电台等报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资企业富士施乐厂、珠海的日资企业三美电机、藤仓电装、美培亚精密马达、松下电子、佳能数码等数家员工人数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资工厂。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部分工厂工人也提出了“收复钓鱼岛”和“日资企业收归国有”的要求。虽然这些罢工行动仍然只是局部现象和小规模行动，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阶级通过这一群众性自发进步运动而逐步导向现实工人阶级斗争。事实上在 2005 年和 2010 年大连经济开发区中日资企业的外来工人连锁罢工和 2011 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罢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资本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汉奸！”的带有民族意识的口号，并且 2005 年大连外来工人罢工还有意将罢工与纪念“918”事件联系起来。而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仍是相互交织和并存的，也说明了在工人斗争中民族意识仍然具有其进步意义。

一直主张关注工人阶级抗争的国际主义左派却将这一阶级斗争重要现象视而不见，实在是令人遗憾。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科洛同志的《冲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龚炯的观点以说明中日经济关系紧密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工人的影响。但很遗憾，这是笃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维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紧密联系和贸易自由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我们也不应该是现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辩护士。无论是在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坚定反对外来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特征）和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支持经济国有化和工人阶级为此而进行的斗争。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中国毛派力量都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保钓反日运动，如毛派中国工人论坛的活跃分子石秋在 8、9 月间就从宗派主义角度得出结论，保钓和反日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因此“工人阶级应该更关心自己的工资，而非钓鱼岛”，并在网络上积极反对工人阶级参与反日群众运动。但是，在

9月下旬石秋和中国工人论坛不得不调整立场，承认“反日运动队伍中，我们发现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这期间，从各个地方不断向我们传来日资工厂工人的“反日”罢工和游行的消息”的现实，并得出结论“这一次以钓鱼岛问题为核心的反日运动幕后主要由资产阶级势力组织和推动；有大量的工人群众参与运动；运动企图利用工人，但同时也被工人利用，小资运动演变为工人运动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局部上呈现蔓延趋势。”

## 民间保钓运动与反对秘密外交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为了证明保钓运动的反动性，特别有专门章节分析香港的保钓运动是为香港特区政府从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时为中共政权服务，而且接受了大量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如政协委员刘梦熊等人的捐款。但这个分析显然是有失偏颇。科洛同志问，如果如同某些保钓活动人士宣称的，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某种向中共政权的挑战，为什么这些民主权利的敌人会资助这一宣传活动？

科洛同志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困境中。正如其承认的，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共政权和香港特区一直是采取种种手法阻挠保钓运动和民间反日和索赔运动的，而且本次钓鱼岛冲突激化后，中共当局虽然派了海监船等前往当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钓运动人士再次出海，并且对参与此次等岛的大陆人士进行打压，禁止其进行宣传，并企图迫使他离开深圳。不仅香港的保钓运动曾遭到阻挠和收买（如古思尧等人反映的，中共当局为了阻止他们出海，甚至采取收买手段，表示愿意给参与者个人经济补助）。而且不仅保钓的反日运动，中国大陆的反日民间索赔运动和慰安妇真相调查人士也屡遭当局打压。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的一些积极参与者也被当局重判和恐吓，而当年反对日本天皇访华的民间异议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国。

按照科洛同志的逻辑，我们反问，假如这些行动不被中共当局视为某种挑战，而只是有助于现政权的话，那么中共当局为何几十年来要一贯对民间保钓运动进行打压呢？

刘梦熊作为金融资本家又是亲建制的政治人物，其资助某一运动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一运动必然反动，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专制政府进行捐助。正如二战与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时期，苏联和中国都曾从美国接受军事援助，并不能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就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工人国家苏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

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就如香港极不民主的小圈子选举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可见其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这种资产阶级建制精英之间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如，欧洲各地右倾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保守的工会和教会等组织都反对欧洲各国加入欧元区，而工国委（CWI）在欧洲的基本立场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欧元区和欧盟。而参与这些反对欧元区和欧盟活动的民众政治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工国委反对欧元区和欧盟是这些右倾的民族主义政党的立场是相同，并是在帮助这些右倾政治力量吗？

而且，与国际主义左派和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设想的相反，中国的国家主义右翼势力和伪左并不支持民间保钓运动和反日游行。譬如不少国内论坛上的国家主义分子和“五毛”们（包括著名的司马南等人在微博中）纷纷指责香港保钓分子的行为是“害国”，影响中共资本主义专制当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与代理人。以所谓揭露香港保钓活跃分子都是泛民反对派中的



“反华乱港”分子，譬如古思尧等曾经在香港抗议活动中焚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论据，甚至推导出香港民间保钓是所谓美国政府阴谋策划的“反华行动”的荒谬结论。

这其实也反映了当前局势下，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和其支持者在所谓“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保钓卖国论”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论”和“抗日亡国论”如出一辙，其本质就是“群众运动亡国论”，也就是国家大事应该听从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干预，更不可以自发的群众运动参与。这宣扬的其实就是“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间的保钓运动和反日游行恰恰挑战了这种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众对专制统治者的不信任，同时也是民众针对国家事务争取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如果追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是因为学生和市民怀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签署不平等的《凡尔赛合约》放弃山东主权而发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最初是台港等地学生和民众反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反对台湾当局（因为当初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在代表中国）在此问题上软弱退让而引发的。而香港保钓运动更具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集会自由与游行自由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斗争的双重特征。而这一保钓运动延续到今天，则更是直接明确地针对接受香港主权的中共当局和反对其专制政治体系和秘密外交。而这也是香港部分保钓成员所谈及的“挑战中共当局的意义”。

无论是2010年的钓鱼岛海域渔船冲撞，还是2012年的香港民间保钓运动人士登岛，都是发生在一个前提下。即中国方面是民间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对钓鱼岛实际控制且全副武装的国家暴力机器。中方的保钓人士行为是在日方挑衅下做出的。香港保钓运动决定8月15日登岛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此后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

8月15日亚洲太平洋地区二战胜利日当天日本朝野政客参拜靖国神社，8月19日将登钓鱼岛悼念二战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员在登岛后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武装人员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人右翼前往钓鱼岛海域并登岛，虽然违反日本本身法律，却安然无恙。

香港民间保钓运动的登岛行为其实更类似于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兴建定居点的防御性行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带有攻击性。就连保钓积极分子也认为，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还是需要与日本民众的沟通。而登岛的主要意义在于民间的自发的权利主张。假如没有这种民间登岛行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释为中国民众对钓鱼岛及其权益丝毫没有兴趣？

科洛同志为了强调民主权利和反对民族主义，在行文中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其他国际主义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这种倾向。但是，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讨论民主权利必然是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框架中才有意义，而不实现民族解放也无从谈及民主权利，任何现实的民主运动都必然存在于某种民族或者国家意识的框架下。假如以为，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众运动可能有利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本质上不也可能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吗？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独立地参与民族运动则必然会提出民主权利的要求。

将民主运动与民族运动看做是黑白对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实是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呢？“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11 页）

**被误读的大连亲日情结和前殖民地宗主国情结**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举例薄熙来曾经任职大连市市长（1993-1999）大举吸引日资， 并因此推导出大连当地的亲日情绪和薄熙来推行的亲资本主义政策所致， 并因此得出部分毛派（并非所有）群众支持薄熙来是自相矛盾的问题。

“薄熙来虽然是百万富翁，但是却被许多激进人士（特别是青年）视作插在当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身旁的一根刺。许多积极参加反日游行的新毛派，认为薄主张 以更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采态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连市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的跳板，据报道没有发生反日游行。大连市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是 日资，也是有超过 20 万学生的日语教学中心。然而恰恰是薄 90 年代任大连市长期间大力吸引日资。”

薄熙来无论是在大连、辽宁、重庆主政，还是中央政府担任商务部长确实都执行过亲资本主义政策，但这是整个中共官僚集团的大政方针，与是否薄熙来担任这个职位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具体到大连当地民众中的亲日情结，大连早在 1984 年就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规定的沿海开放城市，在 80 年代大连街头非法走私的进口车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上路行驶，这比薄熙来主政早 10 年。而大连的亲日情绪更是有其历史因素。科洛同志的观点很遗憾又是接受单方面信息误读导致的。

根据亲法轮功海外中文报刊《大纪元时报》网站报道，在今年 8 月下旬大连事实上也曾经发生小规模反日游行，只是其未能提供进一步细节。但如果回顾近几年大连发生的工人斗争，事实上与反日本资产阶级情绪密切相关。前文提及 2005 年 9 月和 2010 年夏末，大连经济开发区内曾发生连锁型的数十家外资企业数万工人发动的罢工。这些工人以来自其他地区的外来工人为主，他们除了经济诉求外，同时将之与 9 月 18 日的反日纪念日相联系，并且在罢工中喊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日本资本家”的口号。可想而知大规模日资企业投入并没有消除外来工人的反日情绪，反而将之与阶级矛盾联系起来。

大连本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习惯学习日语、在日资企业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据说大连 600 万人口中赴日工作与学习人员高达 30 万），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历史性亲日气氛导致的结果，而并非是导致亲日气氛的原因。否则，无从解释上面提及的像苏州、南通、深圳这些有大量日资企业和学习日语人口的地区发生的反日游行乃至严重的暴力骚乱的现象。

大连的历史性亲日情结从何而来呢？大连有“北方香港”的绰号，这不仅是因为大连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繁荣，也是因为大连和香港极其类似的历史，因为大连恰恰是俄国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国土上从无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战败，日本侵略军占领现大连辖下的旅顺县（当时只有大连湾，而无大连市）和清朝北洋舰队在旅顺的军港，大肆屠杀战败清军士兵和普通平民 2000-20000 人，最后只留下 36 名负责掩埋尸体的中国民众。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世界报》相继报道日军这一暴行，并评论道，“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

这次野蛮屠杀事实上导致大连湾当地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让整个辽东半岛，但因屠杀致外界舆论哗然，而且俄国、德国和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深恐日本独占东北利益，所以派出海军进行武装干预。日本被迫放弃割让要求，而向清朝政府索要三千万白银赔款。俄国则趁机要挟清政府租借大连湾，在当地规划建立殖民城市达里尼（Dalny）和亚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顺港）。

1905 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将正在兴建的殖民城市达里

尼和亚瑟港割让给日本。从 1905 年日俄战争到 1945 年日本二战战败，日本殖民统治大连 40 年，是旧中国，除台湾以外，日本殖民时间最长的地区。日本政府将当地命名为关东州，包含大连和旅顺两座城市，并归日本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管辖。大连由此成为日本帝国在东亚地区重要的军港和经济城市，后来臭名昭著的关东军本部设立于此，也因城得名。

1940 年代，关东州实有人口 70 万左右，其中中国人 40 多万，多数是从山东迁移过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鲜移居当地人口合计三分之一，有 20 万左右。关东州完全进行日式教育，目前大连 75 岁以上老人从小接受的都是日语教育。作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军事重地，大连得以躲过日本侵华的战火和日军暴行。1945 年日军战败投降，未经战火直接被苏联红军接收。苏联将大连作为其太平洋舰队的军港控制到 1955 年，此后根据中苏协议归还中国。至此，大连在日俄两国统治下合计达 60 年之久。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认知这些前外国殖民地的部分阶层居民对于前殖民者的好感和客观理解这种情绪的出现。特别是殖民宗主国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情况下，被殖民民众中的中上阶层和资产阶级得利群体会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结束后仍然保持亲近感。其实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这种想法屡见不鲜，无论是台湾的亲日情结、香港的亲英情结，乃至上海和大连的小资中对宗主国情结都是例证。事实上，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国，这种宗主国情结不少见。当年在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中，也有至少数十万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亲法，并为法国殖民政府当兵和服务。而在当地脱离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后，由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精英集团的统治无能、腐败和野蛮，也会导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阶层和部分对历史无知的青年人出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而怀念前殖民统治或对前宗主国存在各种幻想。

不过并不意味着纵容乃至支持这种情绪。如果把这种情绪视为反抗专制统治，

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情绪，那就实在是大谬了。因为殖民统治下中上阶层的利益其实是建立在剥削其他更广大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无视殖民者的残暴侵略和专制统治，无视受压迫和受剥削劳动人民的抗争，是对进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否定。“97 前，我们家顿顿都吃鱼翅捞饭……”和“假如还是关东州，我们人均收入 4 万美元，去美国不用签证”，绝不是什么进步的争取民主权利的劳动人民的呼声。

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这种对历史的误会在国际主义左派的行文中屡屡出现。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台湾的立场并非如同科洛同志说的，是建立在属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基础上，也并不是只有在台上的泛蓝的国民党政府才予以关注。在争端中组织宜兰县当地渔民和议员出海护渔的宜兰县县长恰恰是民进党政客，而且在台湾立法院通过保钓决议时，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投的是赞成票，而主张急独的台联党投的是弃权票，也非反对票。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逻辑一直是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钓鱼岛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张中国主权，并不是台湾当地人民主张钓鱼岛权利的依据。将钓鱼岛问题与统独问题联系起来，其实无视了台湾人民和渔民的历史权利。

### 被忽视的冲绳人民自治诉求和反美情绪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为了说明中共当局和军方进行的扩张主义宣传，而特别提出了中共军方和智库主张“琉球地位未定论”，及在反日游行中极端民族主义者“收复琉球”和“鼓吹琉球独立”的主张，其原文如下：

“解放军将军和学院呼吁把现时争议领土的范围从钓鱼岛“扩大”到整个琉球群岛，包括有 130 万居民(和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冲绳。这些呼吁依据在于一个含糊的主张：琉球王国在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国。甚

至在一些中国的反日游行中，也出现“收复琉球”和“夺回冲绳”的口号。尽管冲绳人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视，但是几乎不存在支持该岛独立，亦没有支持中国接管该岛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当然绝不支持中共政权和右翼民族分子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张，而且更要明确反对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谓“收复琉球”这种无视冲绳人民意愿的扩张主义叫嚣。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志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再次出主观判断，武断地得出“冲绳当地人民几乎无人支持独立”的结论。这其实恰恰违背了国际主义左派一直以来的主张，未能尊重弱势民族群众自决和现实利益，忽视冲绳人民反美反日情绪与自治诉求的斗争。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琉球曾经在文化和语言上更接近中国文化，但“琉球主权未定论”的依据并不是简单的所谓“在明清时代琉球曾经是中国的朝贡国”的问题。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尔等在历史上也都是中国的朝贡国，而中国朝贡体制下这些的藩属国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原封建王朝无从干涉其内政。现在确实也有极少数极端中华民族主义者会在网络上提出所谓吞并日本、越南、朝鲜半岛和蒙古等国的主张，但这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主张，更不用说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只有绝对的极少数，这也不会成为主张主权诉求的依据。

中国部分国家主义者提出“琉球主权未定论”的真正依据恰恰来自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东亚统治秩序。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战胜国单方面指定日本领土主权不涉及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主权由签署宣言的战胜国中国（中华民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决定。而且，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曾主动向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提出由中华民国托管琉球的问题。1947年时中华民国临时立法咨政机构国民参政会曾经也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琉球主权问题。甚至，台北中华民国政府派驻日本冲绳那

霸县的外事机构数十年间一直沿用“中琉经济文化协会”的名称，以示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直到民进党执政期间 2007 年，台北政府才将“中琉经济文化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那霸分处”。

二战后，美国军事当局管制冲绳时，为了钳制日本战后当局，曾经推动琉球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自决运动。而当美方确认冷战期间要依靠日本制约中苏力量时才放弃对琉球独立运动的支持，但也只承认日本对冲绳的“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而在 1972 年，美国向日本转移的也是冲绳的行政权，而非完全主权。

在 1970 年代前，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恰恰是一直支持冲绳人民复归日本斗争，反对美军驻扎冲绳，将这一斗争与支持日本进步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相联系。这也是当时的中共政权在冷战中争取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资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琉球并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并”（Incorporation），而是“武装吞并”（Annex）。日本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中通过武力强行占领琉球群岛，废除当地王室，改设县治，大举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当地居民使用琉球语和保留自己的文化，将琉球改名为“冲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面临战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逼迫冲绳居民自杀或自杀攻击美军。即使今天对冲绳居民和地区，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体制性和民间的双重歧视。

战后，琉球群岛又成为美国独享的军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乐得将驻日美军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转移给作为“二等公民”的冲绳县。琉球群岛总面积只有日本全国国土面积的 0.6%，但承担约 75% 的驻日美军基地，超过一半以上美军长期驻扎在冲绳。而由于美军驻扎的影响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轻视，迄今冲绳当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冲绳地位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需要谨慎地了解冲绳人民自身的真正愿望，才能做出判断。现实状况中是否如科洛同志所说的冲绳居民中几乎不存在对于琉球群岛独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学副教授的香港学者林泉忠实在 2005 年和 2007 年就琉球独立问题针对 1000 多名冲绳居民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两成受访者支持冲绳独立，七成反对独立。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五成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认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约二成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在台北政府拒绝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的问题上，半数受访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台北政府仍然将冲绳称为琉球的问题上，七成五受访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对冲绳政策的问题上，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对冲绳的政策。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经公开说过，冲绳是日本国内最亲华的县，并以本人是琉球华裔后代为荣。这一结论显然与科洛所说的“冲绳人民中几乎不存在支持独立的情绪”相去甚远。

由于《日美安保条约》下的《日美地位协定》规定，美方对美军士兵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即使在日美军在公务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诉前无需将嫌疑人移交日方。这也就在事实上赋予了驻日美军“法外治权”，众多违纪美军可以逃脱法律处罚。据冲绳县议会的决议和意见书中记载，自 1972 年美国将冲绳“归还”给日本以来，记录在案的美军所犯案件共 5747 起，平均每隔两三天，美国士兵就会在冲绳制造一起违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绳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 年，三名美军士兵轮奸冲绳少女案引发数十万冲绳和日本各地民众抗议，要求美军撤离冲绳和日本。为表示向民众意见妥协，日美政府曾表示将迁移走设置在宜野湾的普天间军用机场。该机场设置在市中心，且占据市区要津，占地面积超过 25%，被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基地”。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屈从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达成协议，引发冲绳民众集会抗议，并因此在 2010 年导致前民主党鸠山内阁垮台。

2005 年-2007 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订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历史和二战罪行，包括否认强迫冲绳居民服役和战时自杀。这一版本教科书得到日本文部省批准许可，不仅在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而且在冲绳当地也引发包括行政长官县知事参与的 11 万群众集会抗议，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许可，立即修改教科书中美化日军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军为增加在亚太地区军力，向普天间机场增派鱼鹰战机，9 月曾引发 10 多万冲绳居民抗议。就在科洛同志文章发布前后的 10 月 16 日，驻冲绳美军士兵再次轮奸当地女性，引发十数万冲绳居民和日本民众参与的数十次大规模抗议，冲绳当地议员和政府官员也准备前往首都东京和美国首都华盛顿抗议。

而且，在冲绳民众抗议美军基地的示威和运动中，也出现“畜生（美国人）滚出冲绳！”（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号和标语。笔者认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谓冲绳人民反对美军的游行与示威就是一场种族主义游行，虽然其中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强烈。

以上事实说明，在冲绳岛内民众中存在至少强烈的自治情绪。而按照支持冲绳独立自称出身“琉球石垣岛”的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琉球人对日本的绝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独立”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选项。

### 中国民众中的仇日情绪与未清算的日本世袭右翼政治体制

无庸讳言，在中国的广大民众中存在强烈的仇日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近年来有增无减，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受压迫情绪日益激烈有关，正如同中国民众仇富和仇官情绪不断激化一样。而且，近来反日游行中出现不少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是阶级压迫通过民族主义异化的一种反映。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专制当局无疑会试图利用此加强其统治和转移矛盾注意力。

自由派资产阶级媒体习惯性地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称为中共当局官方煽动的结果。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声称，正如那些反日口号一样，中共的宣传也是基于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观点。国家媒体刻意培养对全体日本人的仇恨，不断声称整个日本社会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早期殖民战争中在亚洲犯下的可怕战争罪行负有责任。

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在二战后，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恰恰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主流上绝对不是针对日本全体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还以此为理由拒绝向战争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妇”和强迫奴役劳工，以及二战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赔偿。固然这一放弃战争赔款的决定其中有地缘政治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府的操作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被单方面排除在 1951 年同盟国与日本缔约的《旧金山条约》之外），此后中国政府在与日本建交时也是因为不希望将战争赔偿的责任加诸在普通日本民众身上，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普通民众分开而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在战后虽然向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政府发展援助，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需要偿还的。）

而且环顾亚洲，这种对日本右翼统治阶级的仇恨情绪并不只限于中国大陆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种族主义宣传无从朝鲜、韩国和台湾民众，乃至日本本国民众中也蕴藏对日本资产阶级右翼的愤怒。

在钓鱼岛问题上，恰恰不是因为领土争端的冲突产生民族仇日情绪爆发，而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积蓄无法发泄的仇日情绪导致了在钓鱼岛冲突问题上的激烈表现。在今年反日游行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反日游行发生在 2005 年，而当时与钓鱼岛领土冲突无直接关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和

日本要竞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不仅在中国和韩国引发反日运动，甚至日本国内和冲绳民众大规模游行，而日本的反战运动不仅在于反对日本美化战争罪行，更是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参与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美军提供后勤援助和军事扩张。

而这种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于中共专制当局限制民众的基本权利，禁止他们日常发表自己主张的导致的结果。这不同于一般的领土争端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也不同于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领海争端问题。很难想象由于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礁的主权争端上，在中国能动员起数百万人参与的反菲游行。（事实上，中国与越南等国在领海和领土问题面积上的争端远远大于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就领海问题的争端）

假如这种民族仇恨不仅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宣传，而群众运动又不是以民众自发为主的，那是否该关注真正刺激其发生的重要来源呢？西方国际主义左派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今天的愤怒只归结于历史上百年和数十年前日本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的不满。他们的文章中都简略地提及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种种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冲突》一文中提及中国民众中对日本战争时期残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担忧与愤怒。陈骏在《反对》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权宣布国有化钓鱼岛恰逢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也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梅因的《动员》一文中提及中国反日游行高潮主要是围绕 1931 年日本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普劳勃斯登也对中日历史战争背景进行了简略介绍。

但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这种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续积累和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战后继续的资本主义右翼政治体制所导致的。并且与经济和政治危机下日本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势力得以大规模扩张有关。换言之，

如果当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发展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那么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很难得以平复，这是空喊阶级团结和超然中立所能解决的。

实际上在 1970 到 1980 年代间，中日两国间民间关系曾经处在相当亲密的关系，这在相当程度是由于中日两国左翼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日本左翼群众二战后反对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贡献。而随着世袭化的体制性右翼政治体制独家掌握大局和对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群众镇压的结果，导致中日工人阶级和民间关系的恶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孙女亚力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现为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属的右翼“自由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当选出任意大利总理，想来这在欧洲必然会引起左派的轩然大波。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包括总理和议会议长在内的政要近几十年来多次在欧洲战争纪念日公开前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会在欧洲和以色列等国引起强烈抗议。假如德国法院总是裁定德国现政府不必赔偿二战德国纳粹遗留毒气弹导致战后他国平民伤亡和战争奴役劳工带来伤亡（非政府间战争赔偿），想来也会引起欧洲左派群起不满与抗议。

但是，类似事件在日本战后历史，尤其是在 1970 年代以来屡屡发生。10 月 17 日，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其实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势力选择的结果，其个人背景更能说明战后日本世袭化右翼政治体制。安倍晋三出身政治世家，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战后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袭家族政治使岸信与安倍家族垄断山口县半数选票达半世纪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战期间 1940 年代曾经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1930 年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国满洲国的工业部长，大量使用中国奴役劳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曾经名列东京

国际法庭的甲级战犯。但是，美国军事当局为扶植日本亲美右翼政权，未对其审判即释放。此后岸信介旋即成为日本民主党（前）和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内，为通过与美国签订《美日安保条约》，罔顾日本国内左翼和数百万群众参与的反对安保斗争，采取强力镇压。其弟佐藤荣作在出任首相期间，为确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条约》顺利延期，镇压第二次群众反对安保斗争和 70 年代左翼抗争运动，分化冲绳人民反对驻日美军斗争，而且在其任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 2006-2007 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内就将日本自卫队机构从防卫厅提升至防卫省，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日本二战战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与安倍晋三家族之外，另外还有与之有联姻关系的吉田与安信家族。日本二战后 1946-1947 年和 1948-1954 年两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 1920 年代出任日本驻中国东北奉天（现沈阳）总领事和外务省次官，并在 1927 年参与当时首相田中义一组织的东方会议，为入侵和瓜分中国东北及内蒙等地（满蒙）制定战略性计划。吉田茂在美国占领军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并推行“正常化”措施，使 18 万二战后被禁止从政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内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在 2008-2009 年出任日本首相，并积极推动日本天皇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麻生太郎在从政前曾出任家族企业社长，而麻生会社的矿业公司曾经在二战期间非法奴役 1 万名朝鲜劳工和 300 名欧美盟国的战俘从事强迫性采矿服役，并导致大量劳工和战俘死亡，迄今未有赔偿。日本战后大半首相之间都存在各种联姻亲戚关系，并且与众多二战战犯有直接关系。

美国二战后出于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秩序需要，从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罪行，带有封建世袭家族制的财阀政阀体系并未得到废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众多日本战犯都未收到惩罚，并在战后继续在日本政治体制内占据高位。根据相关统计，包括岸信介在内的 48 名甲

级战犯嫌疑人未经审讯即行释放，数千名乙级丙级战犯全数释放。如日本黑社会黑龙会头目海军少将儿玉誉义夫身为乙级战犯向美军提供数亿美元从亚洲战场掠夺来的财富和情报，即被释放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工作人员，并成为自民党创始人之一。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重光葵曾在 1945 年战败前出任日本外务大臣，并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7 年监禁出狱后。1954-1956 年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务大臣。而包括东条英机秘书在内的一些日本将领直接成为美国占领军的顾问而免去任何处罚。正是这一世袭性的右翼政治体制决定日本历届政府和自民党在战后一直未能反省战争罪行，并且镇压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和左翼运动，通过否认侵略、篡改历史、悼念战争罪犯、军事扩张的挑衅东亚各国曾遭受日本军队侵略的人民。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强调，事实上，日本工人和贫苦农民在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下遭受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民少。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政治反对派都遭残酷镇压，迫使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加入军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当炮灰。正由于劳动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敌视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对于除去该国宪法中的所谓和平条款，仍面临着深刻的困难。而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则列举了日本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长官的右翼言论。

两者之间的观点显然发生了冲突。日本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所有的台上政客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而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总计人口近 2000 万。如果没有相当民意基础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论，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当选。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者要强调不能迷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同样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义情绪的“灵丹妙药”。德国纳粹上台时，恰恰是在所谓民主的魏玛政府体制下通过选举实现的。近来桥本龙太郎和桥下彻积极组建新党参与政治活动更说明在经济危机下日本社会中政治意识右转。科洛在文中列举了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党，而自民党则有 35%的

支持率。这并不是说明日本社会中对于右翼的抵制，而是恰恰在于日本左翼的失败，尤其是在 1970 年代左翼运动和反战运动失败后，普通民众对政治失去兴趣，而使右翼独大的结果。

虽然日本社会极右翼政治团体规模并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识就是右翼思想，并一直有强烈的保守民意基础。这也是主流政客为什么经常有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日本历史战争罪行辩护的言行。譬如，和自民党联系密切的日本遗族会就是一例。日本遗族会是由二战后日本军人的遗属组成的民间协会，其主要目标是表彰为日本战死的英灵，促使政府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保护靖国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遗属补助金。日本遗族会核心成员包括前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孙女东条由布子等众多甲级和乙级战犯和其家属，日本多名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森喜郎和小渊慧三是遗族会的会长。目前日本遗族会有 800 多万会员，其中近 20 万是自民党党员，是自民党最重要的票仓之一。而日本遗族会一直推动官员正式参拜的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场所，军国主义的重要象征，1978 年，靖国神社将包括被 14 名甲级战犯在内的近 2000 名战犯列入供奉供奉名录内，而历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被普遍认为是应遗族会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方面，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其国家体制并不独立与完善，日本受到二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放弃了所谓的国家交战权和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而自二战以来，美军就长期驻扎日本各地，并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辖，加之日美军事同盟、《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在日地位协定》等不平等条约约束，美国很大程度上控制与影响日本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和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都长期具有受压制感和屈辱感，而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问题则成为这种屈辱感的一个发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从冷战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大力扩充和发展军事力量，日本军力一直雄踞亚洲前三。2011 年日本本国军费开支约为 550 亿美元，总额排名世



界第六，但国民人均军事开支世界第一，军队人均军费开支世界第一，军队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时，在技术和规模上，日本拥有亚洲实力第一的海军和第二的空军。加之，日本从 1970 年代起就长期承担驻日美军多项开支，若加上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务方面的总开支约为 1000 亿美元左右，与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军事开支相当。而且，从上世纪海湾战争开始，日本政府就积极承担美军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本世纪初更直接派出自卫队参与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后勤援助和索马里沿海巡逻任务，并且据说还派出特种部队接受美军指挥，直接参与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务。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同时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忠实走狗”。

二战后军事占领琉球群岛的美国单方面决定将琉球群岛和并非是琉球群岛附属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罔顾当时斯大林主义的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军事盟友国民党的台北中华民国政府的抗议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 1960 年代，由于对于美军占领冲绳和罔顾法纪不满，冲绳当地屡屡发生农民暴动和市民。迫于大规模群众抗争，美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同时采取暴力镇压和怀柔安抚以挫败左翼群众运动。1970 年，日美需要延续已经 10 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本全国发生了数百万群众参与的激烈反安保斗争，甚至出现占领大学、机场和激进分子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情况，当时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镇压，以维持日美同盟关系。回顾 1972 年日本获得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背景，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决定将琉球群岛与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交给日本，简单地说就是对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褒奖”和对日本左翼群众斗争的安抚。

同时，美国通过钓鱼岛的主权悬置，在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劳动人民间制造不和，进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日本民众对于美帝国主义控制与占领日本这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权益和主权的关注。而今天日本右翼资产阶级独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国政府为在亚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

秩序和反对中国、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蓄意培植的结果。中国和韩国等东亚国家民众的仇日民族情绪显然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体制的产物。

##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对待自发性群众运动的态度

任何群众运动的性质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泾渭分明的，总是同时存在着各种进步的和反动的因素。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力量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是进步的因素与力量，哪些是反动的因素与力量，哪些是运动的主流，哪些是运动的旁枝末节，而这些运动是否有利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认真分析后，才能选择政治上的立场。

针对中国大陆的群众性反日游行，国际主义左派先验性地判断反日游行一定会把参与群众引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方向，换言之，就是群众会通过反日游行支持现中共专制政权。并强调其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会起到负面效应，把中国群众运动的表现等同于帝国主义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这种“负面印象”的出现与中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媒体的夸大宣传有关。国际主义左派的这一立场显然有所倾向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CIT）的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关的民众赔偿诉求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诉求立即给予数百万中国、韩国和其他二战受害国的人民合理的赔偿，他们是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恐怖占领的牺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数十万日本军队强征而遭到强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妇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认这一事实）。同时，日本应该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认朝鲜，并赔偿由其 **1910 -1945** 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损失（注：日本帝国对朝鲜的正式吞并始于 **1910** 年，但其殖民统治开始于 **1895** 年）这一赔偿不应由日本工人承担，而通过向超级富裕的日本垄断资本家征税实现。

这一建议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实现要求日本资产阶级支付赔偿的诉求呢？难道是依靠普劳勃斯登提议的“革命失败主义”吗？如果没有广泛的中、日、韩、朝和台等地群众自发进行的群众运动，包括游行、示威和罢工，而且反对各国统治阶级政府，日本统治阶级如何会屈服而主动赔偿呢？如果要求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众放弃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的民主权利方式斗争，普劳勃斯登又有什么建议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国际主义左派这一超然中立和双重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不正是在纵容日本右翼资产阶级政府和军国主义复苏吗？

国际主义左派在钓鱼岛问题上所犯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并不鲜见。而且那些错误对中国革命曾经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1929年，斯大林主义指挥下的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又极左关门主义地跳到了另一端，在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东北军阀张学良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机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国民党利用中东路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粗暴宣传将苏联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并将中国共产党称为“拿着卢布的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这在结果上确实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地区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民众中的形象，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无法继续工人阶级斗争而转入农村军事斗争具有一定影响。

正如当时与中共决裂前陈独秀指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恰恰帮助了国民党维护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欺骗。陈独秀当时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口号，再辅以下的宣传：不让帝国主义借中东路事件进攻苏联；不让帝国主义者因争夺中东路而相互战争。（其实陈独秀提出的口号尚不清晰，如能明确提出“保卫社会

主义铁路，支持苏联武装托管”的口号更能清楚解释阶级立场和说服中国普通群众)

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不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战争，而且我们也不赞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寄望由中共当局的国家机器与军事力量实现这一任务，同样我们也不会为了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而支持中共资产阶级政权的军事扩张行动或为其行动背书。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当局的扩张主义可能引发牺牲民众为代价的军事冲突，也是因为当局的投降退让可能会最终出卖中国工人阶级和民众利益。

但是无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合理正当的呼声，将游行、示威与罢工的斗争方式和其中出现的种族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反日游行和群众运动中的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反而在帮助中共当局和右翼民族主义获取支持基础，并使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进一步边缘化，而重蹈历史上左派关门主义的错误。因为普通的工人群众无法通过自己组织活动进行斗争，则只会将希望寄托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身上。

同时，左翼的这种指责也无助于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的发展与其反抗资产阶级右翼统治的斗争。恰恰正是因为亚洲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政权，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和他们对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群众运动的镇压，才导致日本左翼运动和反战运动一蹶不振和工人阶级缺乏自己的组织。自**1970**年代反战和左翼运动失败后，日本左翼力量极端边缘化。甚至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事实上也处于政治打压中，其普通党员在生活和就业等各方面都遭到严重歧视。在日本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力量垄断日本政坛的情况下，假如没有来自受害国人民的游行示威抗争，以民众意见表达诉求，只会进一步扩张日本国内右翼声望而打击左翼，在事实上帮助了日

本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资深的反战活动人士对中国调查二战历史真相的活动人士说的，假如你们都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得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绝对不能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以“保卫钓鱼岛”的名义发动战争，但同时必须强烈谴责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钓鱼岛问题上侵犯中国和台湾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并通过直接参与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引导群众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消极因素，而且通过这些群众运动也可以锻炼群众，发展骨干组织力量，实践真正基本民主权利。

资本主义政府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蛊惑民众发动对外战争，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充当炮灰为其火中取栗，但同时也可能为维持统治，而随意牺牲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权益。所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劳动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实现在钓鱼岛及附属海域的权益，只能诉诸于日本劳动人民，通过与日本工人阶级的联合，才能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而实现工人阶级的共同权益。

日本工人阶级分享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和东海权益，也不能寄希望于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国内的右翼政党与组织，必须诉诸于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工人阶级的联合，并深切认识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劳动人民对于自身权益的认识和切实需求。

只有中日台三方的工人阶级在东亚地区实现真正的团结，共同反对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干涉势力和军事存在，那么才可能真正实现和平、民主、环保的共同开发。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上。

要在东亚地区真正解决包括钓鱼岛、独岛和北方四岛等领土纠纷和实现永久和平，只能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东亚社会主义联邦才能实现。

美军立即无条件撤离整个东亚地区，立即废止《日美安保条约》！

支持日本人民和冲绳人民反对美国驻军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

反对东亚地区的中美日台的军事竞赛！

面向中日台美无产阶级与进步劳动人民，实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

团结日本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反击日本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正确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罪行！

要求日本资产阶级和大企业赔偿二战民间受害者损失，反对日本民众承担赔偿责任！

反对本地区任何帝国主义和强权军事联盟，包括美日韩台的军事同盟和中俄等国的军事合作！

反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实现民众的民主政治！

日本军事和警察力量立即撤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区域！

反对任何一方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力量进入和长期占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反对任何激化钓鱼岛冲突和军事化冲突的举动！

反对中日台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动民众民族主义对立和种族主义仇恨！

绝不信任中日台三地资产阶级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决领土纠纷问题！

中日台三方工人阶级联合团结起来，实现本地区永久和平和资源有计划的民主和平共享！

（本文对于国际主义左派的回应，并不意味着本人对于中国毛派和泛左翼在反日群众运动的活动和立场的完全支持。本人如有机会将另外撰文回应中国毛派泛左翼钓鱼岛问题上单极化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且不得不说，事实上包括红色中国网和东方红网站等毛左网站在内，在钓鱼岛问题的相关文章中政治立场的严重退步，甚至放弃了冷战期间毛派一直坚持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立场。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既包括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包括日本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共同利益）

## 就朝鲜问题接受瑞典记者采访

李民骐（2013年2月15日）

原编注：今天（2月15日），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李民骐接受了瑞典文传电讯社驻香港记者约翰·尼兰德尔（Johan Nylander）就朝鲜核试验及相关问题的书面采访。采访内容如下：

尼兰德尔致李：

顺祝平安。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北朝鲜核试验问题的报道，并希望得到您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团体乌有之乡昨天发出公开信，向金正恩祝贺核试验成功。

您是否认为[朝鲜的]核试验是正当的？如果是，为什么？

您是否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北朝鲜及其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批评是错误的？

展望一下未来，您认为北朝鲜的形势将怎样发展，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

我很乐于得到您的意见。我上次对您的采访得到瑞典媒体广泛报道。很多人士都同意您的评论。[编注：此处指李民骐于2012年10月接受瑞典文传电讯社的采访]。

李致尼兰德尔：

谢谢你的问题。我不想冒充是一个北朝鲜问题专家。不过，我乐于与您分享我在有关问题上的一些拙见。

**您是否认为[朝鲜的]核试验是正当的？如果是，为什么？**

北朝鲜的核试验是不正当的。然而，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不要忘记）以色列，这些国家的核武库同样是不正当的。

几个主要大国（自封是所谓的“国际社会”，其实就是现代的帝国主义俱乐部）“谴责”北朝鲜进行核试验，哪怕用最客气的语气来说，这也是极端虚伪的。如果说到危险，北朝鲜的核武库不会比以色列的更加危险。以色列不仅是用言词威胁它的邻国，而且是使用了坦克、导弹和炸弹。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曾经在实际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并且拥有一个足够毁灭世界几次的核武库的国家，美国应当先谴责它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北朝鲜。在六十年代，中国曾经不顾苏联和美国的反对，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中国为自己的核武器所做的辩护就是，这涉及到国家主权与尊严，同时也是为了保卫中国免于帝国主义侵略所必需的。今天，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起谴责北朝鲜。这只不过再一次说明，今天的中国更加关心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

**您是否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北朝鲜及其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批评是错误的？**

北朝鲜很久以前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更不必说共产主义。然而，有必要将北朝鲜的经历放到其本来的历史环境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为历史的产物，来自于一个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整个朝鲜半岛上人民的广泛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侵略和占领，金日成所领导的朝鲜劳动党是可以轻松地在这次公开民主选举中获胜的。如果是那样，朝鲜半岛早就统一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下了。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朝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成功的。七十年代后期，北朝鲜可以说是东亚第二个最先进的工业国，仅次于日本。北朝鲜当时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指标都超过南朝鲜。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在南朝鲜的学生民主运动中，仍然有大量的北朝鲜支持者。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苏联和中国大幅度削减给北朝鲜的经济援助（显然，这与苏、中两国都急于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有关），北朝鲜的经济开始衰退。

到七十年代时，北朝鲜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严重依赖石油供应。随着[来自苏联和中国的]石油供应的减少，北朝鲜的过度现代化的农业体系陷于瘫痪。与古巴不同，北朝鲜自然条件恶劣（朝鲜与西伯利亚相距并不远），因而不能[像古巴那样]发展生态农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化”以后，北朝鲜的农民也荒废了他们原来拥有的传统农业的经验和技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北朝鲜的人均预期寿命仍然超过南朝鲜。但是在苏联崩溃以后，北朝鲜的能源消费锐减，从此以后就一直在与饥荒做斗争。

**展望一下未来，您认为北朝鲜的形势将怎样发展，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

如果北朝鲜的领导集团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话，北朝鲜或许可以成功地将自己调整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出口基地。当然，那个时候的地缘政治状况以及北朝鲜的内部政治状况都不允许这样做。

如果就事论事，北朝鲜今天仍然可以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数以百万计的非常廉价却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现在正处于停滞和危机之中，要找到一种办法，将多出来的几百万工人利用起来，还不能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重建北朝鲜的经济，使其变得对世界资本主义“有用”，就要花费至少几千亿美元。所以，从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将北朝鲜结合进来不再是有利可图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美国早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北朝鲜实行“政权更迭”了。对于美国、日本、中国和南朝鲜的资产阶级来说，一个崩溃的北朝鲜是比一个核武化的北朝鲜可怕得多的一个噩梦。

对于美国和东亚的资产阶级来说，一个“理想”的选择，是让北朝鲜慢慢地、逐渐地“开放”，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逐渐地将北朝鲜的廉价劳动力利用起来。我想，这就是所谓“大交易”的全部内容（[所谓“大交易”就是北朝鲜放弃其核武库，以此换取安全“保证”和经济利益；然而，在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后，谁还会相信美国的安全保证？）。然而，北朝鲜的领导集团认识到，这样做，几乎肯定会导致北朝鲜政权的自杀，于是决定，还不如将自己封闭起来。

如果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况可以作为根据的话，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北朝鲜将导致东北亚地区战争危险的减少，而不是增加。美国将会假装进一

步加紧制裁（但是美国还能制裁什么）。中国，在说了一堆没用的口头制裁以后，将会继续执行其目前的政策，即给与北朝鲜最低数量的物质“援助”（实际上，中国是在剥削北朝鲜的矿产，而仅仅提供给北朝鲜最少的石油和食物），仅仅使北朝鲜得以免于崩溃。

在所有这些考虑中，有一张牌或许会不按牌理出牌。那就是，在中国的统治集团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动中国全盘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这股力量与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联系要胜过他们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利益联系）。中国统治阶级中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有，现任总理温家宝、即将上任的下任总理李克强、几乎全部的经济管理官员，以及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官员。他们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是，[中国]要做一个现行国际秩序范围内的“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说，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其中有些人，公开主张抛弃北朝鲜，以换取美国给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适当的地位。

有这样一种并不算小的危险。那就是，中国统治阶级中的新自由主义派，利令智昏。如果他们过度地热衷于讨好美国，以至于压迫北朝鲜过甚，并导致北朝鲜垮台。那样的后果，将不是[美国和东亚]这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所能承受的。所以，他们最好还是不要那样做。

与此同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几乎一切地方，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在激化。如果北朝鲜能够设法再坚持十年，中国、日本和南朝鲜恐怕都会淹没在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之中。到了那个时候，一切政治方程式都要重新计算了。

上天入地，尽在习总书记一念之间

远航一号（2013年2月26日）

这两天看了大度胖子同志、海岩同志、前朝遗民等同志的发言，涉及当前斗争方向与策略问题。我还没有成熟想法，随便说几段，与大家聊聊天。

今天早上看到大度胖子同志的回复文章，是而东编辑置顶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问题的讨论要不要降降温。认真读了大度胖子同志的文章，确实属于言之有物，是认真讨论问题的，不是单纯意气用事，可以作为广大红色网友讨论的基础。

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些不同意见，准备挨骂。大度胖子同志的不少认识都是准确的，在挺薄、降温的大方向上都是一致的。但是，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现在是否左派倾巢出动与邓温贪腐势力决战的时机？不知道大度胖子对多维纽约居士的分析有何见解？我个人认为，他对上层力量对比的分析还是符合实际的。

薄熙来同志的问题、清算温家宝的问题，光靠一般的网络呼吁、签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后，说白了，只有在发生了革命形势以后，才可能作为一个群众运动的基本要求提出来并争取解决。否则，单单靠目前上层的力量对比，习近平方面，动机与力量恐怕都不够。

不要说薄熙来的问题，哪怕是潘石屹、任志强的问题，我都不乐观。大度胖子怕专攻潘、任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看，习恐怕连潘、任都动不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天，网络上打击潘、任始终没有升温。习要动潘、任，在面上，就要面对全体右派公知的压力，背后有整个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而房地产利益集团

背后就是温、李，温、李背后就是邓家。习能取得邓家的谅解，让他以部分牺牲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代价换取政绩吗？以邓家的睚眦必报，他们有这样的远见吗？

所以，我看，不仅温倒不了，连潘、任都不了了之。那么，是不是革命、进步力量就没有希望了呢？不然，不仅有希望，而且前途远大。首先就事论事。以习的力量，不审薄是不可能的。但是，留住薄的青山，他还是办得到的。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是把自己后路断绝，大不利。

就左派来说，未来十年的希望，不在上层，也不在网络，而在工人阶级。不要被右派公知的喧嚣所吓倒。在坚持网络斗争、坚持青年工作的同时；积极等待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成熟。我说等待，可能很多同志不满。不满就不满吧。事物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拔苗助长是不行的。一方面不要拔苗助长，另一方面要坚信苗是可以茁壮成长的，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

金融时报最近有一个消息，说富士康暂停招募新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制造业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无产阶级化的程度来看，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已经为期不远了。

最近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宪政、如何对待工会的问题。大家放心，以中国资产阶级之短视、之贪婪、之无能，一旦中国工人阶级起来，中国资产阶级一定无法满足中国工人一系列貌似改良的要求。他们的宪政、他们的工会，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切政治经济现象一样，最后一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工人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斗争就必然上升为政治斗争，中国工人争取“改良”的斗争就必然上升为革命的斗争，开始是貌似资本

主义范围内的斗争就必然上升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全国范围就会出现革命形势。

不要怕被自由派利用。一旦群众起来，自由派想利用都利用不了。一旦群众起来，很自然地，左派就可以加入到群众中去。一旦群众起来，很自然地就可以提出清算温的问题，并以清算温作为一切政改的前提、一切政改的条件。一旦群众起来，很自然地就可以提出为薄熙来同志平反的问题，并以为薄熙来同志平反作为是否有条件宽恕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原罪的大前提。

到了那个时候，人民群众的要求将是不断升级的，而资产阶级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的能力将是不断下降的。几乎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让步都将引向社会主义。就说“小小”的雾霾问题吧，不增加资本家的经济成本、不增加“中产阶级”的消费成本，就解决不了。如果真的开始解决了，就一定要触动资产阶级利益，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所以，左派要沉住气，要忍耐，要坚持斗争，也要积蓄力量。

最后，也给习近平同志一点建议。读了习近平同志最近几次讲话，与一些革命派同志不同，我对习近平同志是有一些期待的。从习近平同志最近的讲话来看，习近平同志不想做戈尔巴乔夫，不想做崇祯，不想做亡国之君。我认为，这个“不想”是真诚的。而且，习近平同志也认识到了，不仅不能做亡国之君，而且一定不能与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彻底切割。如果彻底切割了，习近平同志所在的那个部分“红二代”集团的利益也就保不住了。这个考虑，对人民是有利的。

但是我要对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亡党已经很难避免了。改开之路、特色之路，还没走到头，但是也就是还有个五到十年的光

景。所以，应该考虑后事了。温家宝以及右派公知、西方帝国主义给你开的药方，就是跟他们走，主动政改，走邪路。不知道你能不能顶住压力。能不能顶住压力，要由你来决定。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顶不住，将无碍于未来中国工人阶级胜利的大局。真到了那个地步，你以及你所代表的集团有步穆巴拉克、卡扎菲后尘的危险。

如果你顶住了，将是人民之大幸，也是红二代之大幸，也是你个人之大幸。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清算温氏，请邓家出国，给薄熙来同志平反，召开没有反动卖国分子参加的社会各界国是会议，以定大局。如此，你将立下不世之功，名可垂青史。

上天入地，尽在习总书记一念之间，望一思、再思、三思。。。

海内外各界人士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反对铁路私有化

2013年3月15日

## 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意见

各位代表：

我们都是中国公民。值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就铁路管理体制问题向你们提供一些意见，望得到你们认真考虑。

据新闻报道，此次全国人大会议，将要审议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内容是要撤销铁道部，另成立铁路总公司，为引进私人资本提供方便。对于这个改革方案，我们深感忧虑，不能不行使公民的职责、表达我们的意见。

铁道部成立于建国初期。铁道部的广大职工为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以来，铁路建设大发展，很好地配合并且促进了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并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中下层群众）在长途交通运输方面的需要。

目前，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电气化铁路里程和高速铁路里程均达到世界第一位。据统计，2000年至2010年，我国铁路系统累计运送旅客130亿人次，每亿人次重大事故死亡人数2人。相比之下，同期，日本铁路每亿人次重大事故死亡人数9人；印度每亿人次重大事故死亡人数920人。可见，我国的铁路系统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比较安全的。

众所周知，我国的普通旅客铁路是经济实惠的，1995年以来18年没有涨价，在困难的情况下满足了亿万普通劳动者的需要。就主要以中高层收入者为服务对象的高速铁路来说，我国高铁每公里平均票价仅0.04欧元。相比之下，德国高铁的平均票价为每公里0.27欧元，日本为每公里0.22欧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目前的铁路管理体制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的铁路发展和运营状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领先的，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没有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征求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的情况下，轻易推出撤销铁道部的机构改革方案，是十分草率的，是不够负责的。

首先，撤销铁道部，另成立铁路总公司并引进私人资本，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有哪些重大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学术上的好处），要经过充分论证，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楚。反面的意见，也要给予充分发表和听取的机会。

另一方面，撤销铁道部并成立铁路总公司、引进私人资本后，有没有重大风险、有没有重大代价？铁路不是什么新兴产业，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与我们相比，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都是有大量资料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铁路私有化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这些惨痛的失败教训，要不要吸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于避免这些失败教训有没有准备？如果没有准备，轻易改动体制，拿事关十三亿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开玩笑，难道不是草率和不负责任吗？

铁路总公司一旦按照市场原则把利润作为目标，火车票将不再廉价，这无疑会影响广大中下层群众尤其是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同时，铁路要想在中西部偏远地区发展，必然需要国家财政的补贴。铁路总公司一旦引入私人资本，国家补贴就不再纯粹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成了变相补贴私人资本的工具。以英国为例。私人资本进入铁路系统后，英国成为全世界火车票价最高的国家。同时，政府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私人资本，是私有化之前的数十倍。自私有化以来，英国铁路的服务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成为欧洲最拥挤的铁路系统；同时，英国铁路交通事故层出不穷，包括 2000 年因铁路维护不力而发生的哈特菲尔德火车事故。

虽然我们无从了解国务院有关部门决策的具体过程，但是根据各方面新闻报道，仍然了解到，主张撤销铁道部的一些人士希望通过撤销铁道部为铁路系统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扫清障碍。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显然，小平同志只是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而决不是唯一的手段，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

式。既然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更可以有计划。邓小平同志更是从来没有主张过私有化，也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只有靠引进私人资本才能为人民服务。

过去的一个时期，我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许多领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某些改革领域，由于改革主导者片面强调市场化，客观上对大量国有企业搞了私有化，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国有资产大批流失、贪污腐败泛滥、环境污染恶化以及许多人民群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不到放心食品等恶果。对于这些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是到了好好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过去盲目市场化造成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总结，找出病因，并且一一纠正，就急于发动新的市场化，又是在铁路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一旦将来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由谁来负责，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在全国人民面前，又有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然，铁路系统管理的现状，确实有很多不足和缺陷。铁路系统内部，也存在着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目前也是在我国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如果咱们国家的领导人确实有决心、有能力，要努力杜绝或者至少遏制贪污腐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那么，即使保留铁道部，铁道部现有的一些问题自然也会随着各级政府部门的改善而改善，从而成为清正、廉洁、高效的铁道部。

如果政府对于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没有办法，那么请问，把铁道部改组为铁路总公司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把铁路都卖给私人，政府能丢弃监督管理铁路的责任吗？如果政府解决不好铁道部的问题，我们凭什么相信政府可以解决好新成立的铁路局的问题，可以解决好交通部的问题，可以解决好国务院的问题？

本来，我国现有的铁路管理体制，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成绩是主要的，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路系统的广大职工是有功劳的。对于我国现有的有一定优越性的体制不坚持、不在坚持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完善，而非要去学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优越性并且不乏失败教训的体制，有关部门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实在是匪夷所思！

各位代表，你们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根据我国宪法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殷切希望，你们能够认真行使代表权，认真审议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否决那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

全国人民在看着你们！

（各位代表，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你们没有能够充分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因而在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时，不仅批准了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而且批准了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那么我们以及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对此表达严重的遗憾。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重新考虑你们的决定，并且在将来最早的适当的时候修改这一错误的决定。）

本公开信对海内外一切中国公民开放签名，凡愿意签名的朋友请给如下邮箱来信表达意愿：[lianmingxin3011@yahoo.com](mailto:lianmingxin3011@yahoo.com)

**我们建议签名者提供实名和所属机构，不愿意提供实名的也可以笔名签名。**

（签名）

已签名名单见下页，至签名活动结束时止有 307 人签名，许多为海内外知名人士。

按签名顺序排列：

1. 李民骐 犹他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2. 许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3. 李钟瑾 麻省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4. 陈瀛 麻省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5. 齐昊 麻省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6. 严海蓉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7.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8. 薛金泉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华润万家配送中心
9. 林春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0. 樊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
11. 項觀奇 愛國僑胞
12. 江根德 上海
13. 韩东屏 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
14. 陈洪涛 河南

15. Joy L. Gao 洛杉矶
16. 孙秀忠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自由职业者
17. 朱剑昆 爱国侨民
18. 董迺斌 美国明尼苏达州高级工程师（中国公民）
19. 谢妮娜 新西兰爱国侨胞
20. 苑军 山西太原
21. 广龙 德国
22. 毛岩 工商管理硕士 美国爱国华人(中国公民，前中国共产党党员)
23. 柏棣 美国德儒大学东亚系教授
24. 艾中华 旅英爱国侨胞
25. 黄正涛 加拿大多伦多 Forward Signs Inc.
26. 王信玮 博士 美国埃文思分析集团
27. 胡大江 美国芝加哥 美国华网社长
28. 黄方伯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离休干部
29. 李文采 大陆 自由职业
30. 杨忠 加拿大 工程师
31. 曹兴金 博士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32. 陈军瑞 河南荥阳市 自由职业
33. 新兵 网友
34. 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
35. 胡永晖 浙江元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36. 张大伟 广东省汕头市外来普通打工者
37. 林军 武汉教师
38. 向平 加拿大 爱国侨胞
39. 肖水 诗人 作家
40. 左右 陕西万邦图书城有限公司编辑、策划人
41. 劳拉娜 澳大利亚华侨
42. Bill Huang California State Contractor, Licensed & Bonded & Insured
43. 曹新仁 上海市浦东新区 失地农民
44. 朱惠娥 上海市浦东新区 失地农民
45. 王庆人 南开大学教授
46. 铁为民 网友
47. 王泽溪 网友
48. 耿加贝 网友
49. 黄懿翎 网友
50. 陈玉龙 网友

51. 张耀祖 中国工人网主编
52. 张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53. 常青 华岳网友
54. 王希哲 美国加州自由作家
55. 陆桂华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56. 张小燕 Irvine, California.
57. 黄德胜 加拿大老知青
58. 陈雪松 河南
59. 盛云 湖北
60. 董善渭 四川科技馆工程师
61. 杨杰 北京文化经纪人 自由职业者
62. 傅应军 安徽合肥退役军人
63. 泥土 山西运城农民
64. 葛啸菟 网友
65. 赵剑斌 哈尔滨作家
66. 徐长波 宜兴市教师
67. 马卫民 网友
68. 赵志勇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69. 宫延庆 大连
70. 岳臣 劳务派遣工
71. 李小健 明尼苏达大学组织领导和政策发展专业博士研究生
72. 姚久民 网友
73. 周彭力 中共党员 江苏省徐州市粮食局公务员
74. 陈小元 工程师 美国德州
75. 古学斌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76. 徐卫华 网友
77. 黄根华 广东普通打工者
78. 清泉石上流 网友
79. 羊晓涛 硕士 香港理工大学
80. 张伟之 网友
81. 罗曦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
82. 于闽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83. 麦浪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数学硕士 纽约同耕学社社长
84. 杨桦 美国波士顿信息管理工程师
85. 恽仁祥 原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后勤组组长 四届人大代表 革命先烈恽代英远侄
86. 寇学民 美国洛杉矶

87. 赵海龙 网友
88. 袁庚华 郑州市民间学者
89. 林元辉 北大自由编剧
90. 王泽峰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助理教授
91. 刘子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92. 李欣广 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
93. 熊海泉 慈溪市安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负责人
94. 张见峰 北京 社会学学生
95. 袁长庚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96. 贺财宝 山东群众
97. 夏瑜峰 上海市民
98. 余峰 中国工人网
99. 余晓琼 成都人
100. 唐利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1. 李家强 重庆市退休工程师
102. 张利 山东
103. 苏城 湖南省郴州市
104. 何青 北京市民
105. 朱超杨 网友
106. 杨连民 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
107. 朱文熙 中国名博沙龙理事
108. 萧升 网友
109. 李明文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者
110. 马千里 伊斯兰民刊《关注》编辑
111. 张大林 上海普通打工者
112. 陈万新 北京
113. 殷之光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114. 张智敏 上海
115. 宋岗腾 网友
116. 夏宁 网友
117. 陈敬慈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118. 胥黎明 南充
119. 艳阳天 黑龙江齐齐哈尔网友
120. 刘波 网友
121. 傅光国 深圳南山，退休高级工程师

122. 谢保安 武汉
123. 李桂清 武汉
124. 周小林 中国共产党党员
125. 陈钰堆 退休干部 烈士遗属
126. 周伊康 企业在职职工
127. 夏宁 企业退休职工
128. 翁立国 企业退休职工
129. 李小凤 烈士遗属
130. 田永进 企业在职职工
131. 刘点 驻马店
132. 赵军伟 驻马店
133. 李双 驻马店
134. 李车铭 驻马店
135. 吴江苏 驻马店
136. 马诺 驻马店
137. 杨鑫 湖南公务员
138. 洪起 网友
139. 许东辉 网友
140. 王双玉 河北石家庄辛集市退休干部
141. 周西宁 四川省内江市
142. 钮忠民 浙江杭州
143. 彭龙 湖南岳阳
144. 韩忠城 网友
145. 汤大立 网友
146. 赵志锋 河北邯郸
147. 赵志勇 湖北
148. 张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149. 隋志平 大连
150. 杨国珍 中石化江苏油田高级工程师
151. 林协宝 中石化江苏油田高级工程师
152. 李新民 河南驻马店
153. 王勇 网友 共产党员
154. 陈民整 中兴 利比里亚
155. 王军学 江苏 工程师

156. 蔡晓军 山东寿光  
157. 韩留来 河南驻马店  
158. 李军 湖南  
159. 李景荣 河南驻马店  
160. 郑小强 网友  
161. 陈红兵 河南网友  
162. 华乔 上海 摄影家  
163. 金泳涛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经济学院  
164. 艾兴锋 湖北荆门工人  
165. 胡国光 图书管理员 退休干部  
166. 汤登文 新疆阿克苏  
167. 陈刚 江苏南京  
168. 徐华 江苏无锡  
169. 孙剑 多伦多自由职业者  
170.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171. 王月凌 河北省 共产党员  
172. 李占军 河北省  
173. 马典 四川省攀枝花市工商局  
174. 胡志勇 广东工人  
175. 房春草 北京 教师  
176. 雷强 原长庆油田职工  
177. 池伟添 广州学生  
178. 戎士林 河北北方学院退休干部  
179. 朱光星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180. 严家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研究员、首任所长  
181. 何光辉 网友  
182. 梁滔 普通劳动者  
183. 吴圣飞 重庆市  
184. 徐黎明 山东工商学院  
185. 陆纤夫 退役军人  
186. 李杰克 旅美退休高级工程师  
187. 倪翠华 北京退休职工  
188. 刘唐礼 网友  
189. 杨海涛 浙江企业策划经理  
190. 丁慧生 北京丰台区居民，退休高级电子工程师  
191. 徐开彬 美国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192. 康邪 上海工程师



193. 邹光全 湖南 军转干部
194. 网翼 江苏省
195. 陈荣光 旅美华侨 退休电脑编程工程师
196. 金娜 澳洲 哲学与货币银行研究生
197. 何庆林 云南省昆明钢铁集团
198. 钟剑 加拿大软件工程师
199. 王丹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
200. 黄瑜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201. 王洪喆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
202. 孟荣伟 湖南长沙市 原国企退休干部 中共党员
203. 朱云 网友
204. 吴育民 上海浦东炼钢工人
205. 张大林 上海普通打工者
206. 叶伟锋 美国工程师
207. 陈昊 美国乔治亚州
208. 卢荻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09. Joseph W. Zhou President,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 Insurance, Cary, North Carolina
210. 刘先明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退休职工
211. 罗志学 广东珠海医务工作者
212. 李玉和 杭州退休高级工程师
213. 李东来 广东清远市打工者
214. 李光新 网友
215. 杨占国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216. 邹文利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博士后
217. 刘亚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博士研究生
218. 王洪玉 网友
219. 田军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经济顾问
220. 陈跃 网友
221. 邓韵雪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222. 黄翼予 网友
223. 罗雅华 网友
224. 封嘉延 北京退休教师
225. 刘海林 中国吉林长春
226. 农成胜 广西

227. 杨琼 波士顿大学副教授
228. 那青 北京
229. 傅宗明 网友
230. 张旭 湖南岳阳市巴陵石化工人（党员）
231. 李锦 退休教师 纽约轩辕社社长
232. 范璐璐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233. 梁自存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234. 孔伟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235. 王传斌 山东滕州农民
236. 吴子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237. 陈航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238. 任磊 湖北武汉
239. 刘小春 河北张家口市公务员
240. 沈继辉 英国阿德莫建筑集团采购经理
241. 沈承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毕业学生
242. 李双龙 日本九州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243. 孙剑 网友
244. Daniel F. Vukovich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45. 邬伦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246. 唐伟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247. 李长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48. 蓝可林 贵州开阳
249. 宋文辉 广东韶关下岗工人
250. 梁千岭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百川盟副盟主
251. 钟雪萍 塔夫茨大学德俄亚语文学系教授
252. 巫爱金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硕士
253. 方琼 湖北省仙桃市下岗职工
254. 梁淑美 网友
255. 顾秀林 云南财经大学 特聘教授
256. 田钰 广西
257. 寒梅 广东省广州市中学教师
258. 路海 上海 自由职业者
259. 刘海涛 安徽马钢公司职工

260. 陈霖 辽宁大连 地产 营销人
261. 宋保存 太原 退休工人 党员
262. 闫玉田 阳泉私营企业
263. 韩爱喜 太原下岗工人
264. 唐小丽 太原下岗工人
265. 任来银 太原退休工人
266. 连树德 太原下岗工人
267. 王书祥 太原退休工人
268. 谭喜武 吉林长春下岗工人
269. 黄勇（黄定彬）网友
270. 张兰英 内蒙古
271. 吴树原 博士 奥克兰理工大学高级讲师
272. 罗其云 北京 退休软件工程师
273. 田仲强 沈阳市沈北新区
274. 王之洲 北京自由作家
275. 秋火 出身铁路职工家庭、现在深圳工厂的普通打工者
276. 杨建 网友
277. 何宇飞 香港大学社工系学生
278. 方科 广西农艺师
279. 小李 长沙个体户
280. 孙爱玲 河南开封
281. 任长春 北京自由职业者
282. 钱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83. 肖红 网友
284. 刘友焜 江西省萍乡市
285. 张廷林 网友
286. 育才 河北省沧州地区教师

287. 朱文 上海退休工程师
288. 方然 南宁三中 学生
289. 郑铮 医生 河南省方城县
290. 李留柱 退休干部 河南省方城县
291. 陈庆永 退休干部 河南省方城县
292. 徐保卿 农民 土山村毛主席纪念馆创建人 河南省方城县
293. 赵春友 下岗职工 河南省方城县
294. 刘中东 下岗职工 河南省方城县
295. 芦建坚 下岗职工 河南省方城县
296. 赵宏 网友
297. 鄭偉謙 香港
298. 姜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老师
299. 郭康 云南
300. 赵强 网友
301. 老竹 网友
302. 张玲燕 网友
303. 黄小娜 网友
304. 丁丽 网友
305. 贾中原 网友
306. 黄先裕 网友
307. 李定凯 清华大学中共党员、退休教授

##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铁路私有化？

（副标题：中国的富人们，要肉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

李民骐（2013年3月15日）

据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于北京时间今天（3月14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铁道部将被撤销，另成立铁路总公司。铁路总公司成立后，将引进私人资本，为铁路私有化敞开了大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早晚是要纠正的。不是由全国人大自己来纠正，就是由历史来纠正。

两天前，我与几位青年经济学者以“留美经济学博士”的名义共同发表公开信，紧急呼吁全国人大不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不利于人民利益的部门、制止铁路私有化。公开信发表后，得到若干社会知名人士的热烈赞成。在他们的建议下，临时决定对海内外各界开放签名。由于事起仓促，准备不足，实际宣传动员的时间仅有一天，加之开放签名的公开信在国内各网站、微博发表后旋即被删除，公开信的传播遇到了巨大困难。

尽管有这些困难，公开信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至北京时间3月14日下午7时，有233人在公开信上签名。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署名工人、下岗职工、退休职工、失地农民等），有许多普通的职业人士（教师、医生、工程师），有老干部、老党员，有成功的商业人士，有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林春、卢荻、潘毅、严海蓉、柏棣），有国内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维权人士（如赵剑彬、袁庚华、张耀祖），有海外侨界代表，有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如中国名博沙龙理事朱文熙、亚洲开发银行顾问田军），还有长期的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如严家祺、王希哲）。这说明，公开信所得到的支持是有代表性的，公开信的支持者来自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政治倾向。今后几天，我们拟以适当的渠道，将该公开信以及完整的签名名单转达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也有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们，你们这样“上书”中央，不会有用的。是的，是不会有用的。但是，我们不是给“中央”上书，而是给人民大众上书。这种“上书”，今天听到

的人、用心听的人，还不是很多，但是正在增加。这次公开信所获得的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表明，这种“上书”在未来的听众将是十分广大的。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重难返，各种经济、社会、环境矛盾呈几何级数增长，市场化、私有化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勉强要走，只能失败、只能崩溃。

雾霾、三聚氰氨、毒大米、富士康工人N连跳、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毕业即失业、笑贫不笑娼，凡此种种，有一个总的根源。那就是，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暴发了，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少数人暴发了，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资产阶级暴发了，人民大众被剥夺了。

要避免崩溃，唯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减少资产阶级的财富，增加人民大众的财富。确实，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要攻，就攻资产阶级的坚，不要攻人民大众的坚。人民大众已经被彻底剥夺，再攻下去，就突破底线了！收入分配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反腐败也好，民主化也好，敢触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真改革、好改革；不敢触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继续吞噬社会主义残余的基础，就必然是假改革、坏改革。假改革、坏改革必然失败。

在中国今天具体的条件下，减少资产阶级的财富、增加人民大众的财富，这就是进步；反之，就是反动。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尚未结束，但是已经维持不了太久了，暴风雨就要来了！进步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都在准备迎接这一场暴风雨，为此都在集结自己的力量、检验自己的队伍、擂响自己的战鼓。

血雨腥风还能够避免吗？汪洋同志说：改革就是割自己的肉。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人们，是时候了，该下决心了，割肉吧！肉割了，还可以再长；命丢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了。

要肉，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

## 专访反对撤销铁道部联名公开信的发起人

刘杰（2013年3月21日）

采访者：红中网编辑 刘杰（以下简称刘）

受访者：反对撤销铁道部联名公开信的发起人（以下简称联）

时间：2013年3月18日

刘：反对撤销铁道部的公开信从公布到现在，已经告一段落。请问，你们的目的达到了吗？

联：从公开信发布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八天，尽管人大通过了拆分铁道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的公开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刘：能简要回顾一下你们是如何想到写这样一封公开信的吗？

联：好。事情要从3月10日说起。当天上午，中编办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撤销铁道部，成立铁路总公司。从10日到14日交由人大审议通过，只有5天时间，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么重要的改革方案没有经过社会讨论和意见征询就匆忙上马，是搞突然袭击。把铁道部公司化，让铁路追求利润，会导致火车票价大幅上涨，影响低收入者的切身利益。将来铁路总公司要引进私人资本，有可能又是一场私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铁路系统为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仅仅用5天时间决定铁路系统的命运是极为草率的，也是唯市场化至上、政府盲目退出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刘：你们发起公开信的时候，有没有设想会出现什么结果？

联：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写公开信。我们只是觉得，反对撤销铁道部必将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大家商量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发出我们的反对声音。到11日晚上，有同志提出，索性写一封致李克强总理的公开信，反对铁道部公司化、市场化、私有化。当时有的同志有顾虑，担心公开信的方式过于尖锐，但大家讨论之后，觉得此事应该针锋相对，有反对意见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所以一致同意了公开信方案。公开信就这样发起了。

刘：可是我看到，你们公开信里并没有写李克强的名字。

联：对。我们的公开信是写给“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可能代表了我们的历史观吧。事情变坏不是某些人使坏，事情变好也不依靠某些人变好，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其实，公开信的撰写和修改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当时时间紧迫，中编办可没给我们做慢慢研究的时间啊！

刘：是啊！你们以前曾经写过类似的公开信吗？

联：没有，这是第一次。

刘：那么你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

联：我们没有任何宣传经验，所以担心公开信成了“私信”。听说新浪微博上有很多粉丝都是假的，通过这种手段，新浪成为许多名人拥有亿万粉丝的幕后推手，实际上也把新浪所喜欢的观点强加给了社会。我们要是有新浪这种网站，那就不怕公开信传播不出去，但恐怕新浪是绝对不喜欢我们的观点的。我们的宣传方法，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亮出来，用光明正大的态度去打动别人，通过我们能想到的各种网站进行传播。

刘：你讲得很有意思。你们一开始都在哪里发布公开信了？

联：我们大概是从12日清晨开始发布公开信的。最早在新浪微博，我们有个“普罗-普罗”账号。本来，11日下午这个微博已经发布了反对撤销铁道部的图片，但新浪十分警觉，在转发量短时间内增加到50次的时候删除了微博。所以，我们在12日对公开信在微博的传播更加小心翼翼。一是文字说明比较短，以前在发布图片时采用的是“坚决反对铁路市场化，坚决反对铁路追求利润最大化”等说明文字，现在只说“留美经济学博士联名公开信反对撤销铁道部”。这样，我们猜想新浪注意到公开信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二是在发布公开信的同时推荐给别人，请别人帮助传播。一旦转发量增多，特别是一旦有人用自己的账号发布该微博，新浪想删也删不过来了。

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你们首战效果如何？

联：从12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微博转发速度逐渐加快，12点之后基本每分钟有两三个人转发，到晚上已有1000多次转发量，400余人参加讨论，大多数都支持我们。同时，许多人用自己的账号发布该微博，有高达数千的转发量。“证券市场周刊”在腾讯微博发布了公开信，阅读量有2.6万次。通过微



博，我们和四月网取得联系，促使公开信在四月社区提前发出。微博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果。

刘：看来微博的确很重要，其他网站效果怎么样？

联：我们在人人网也有一个名叫“普罗”的主页，上面也发布了公开信。通过我们几个人转发，公开信在人人网上迅速传播。到 13 日晚上，人人网有 6000 多人阅读公开信，200 多人转发，公开信成为人人网热门分享日志。不过，人人网上有支持我们的人，也有大量质疑声和反对声。我们事后总结人人网上弥漫着一种“两个凡是”的浮躁气氛：凡是提出改革方案，他们就要支持；凡是拥护社会主义，他们就要反对。

刘：看来你们对人人网上的青年学生很失望？

联：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经过冷静思考的留言，也有人向我们提出善意的建议，而那些对撤销铁道部感觉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的确反映出青年学生中的浮躁气氛。

刘：恩，我明白你们的感受。除了微博和人人，我看到许多网站也转发了公开信。我这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列了转发你们公开信的网站：**MITBBS**、多维博客、四月网、人文与社会、独家网、天涯论坛、中华论坛、乌有日刊、红歌会网、红旗网、东方红网、华岳论坛、看看新闻网、国家能源网、水木社区、人大经济论坛、凯迪论坛，其他的我就不念了。这些都是你们主动发在网站上的吗？

联：部分是我们主动发到论坛上，或是向网站编辑投稿。其他的比如 **MITBBS**、看看新闻网、国家能源网、水木社区、人大经济论坛、凯迪论坛等，是主动转发我们的公开信。此外，还有不少人在新浪、搜狐、网易、光明网的博客中转发了公开信。

刘：我看到这些网站上的公开信都是你们五个人签名，后来为何改为公开联署了？

联：事情是这样。严海蓉、潘毅等人看到公开信之后，建议我们公开联署，所以公开信的题目变为“各界人士联名公开信反对撤销铁道部”，正文中涉及经济学博士生的内容就去掉了。

刘：我看到最新的联名名单，截至 3 月 18 日，一共有 **300** 人。你们是如何征集到 **300** 人的签名的？

联：进入公开联署阶段已经是 13 日凌晨，离人大投票只有 1 天。从 13 日凌晨到 14 日，我们几个同志 24 小时轮班更新联名名单，现在共有 300 人联署。其中，著名人士包括严海蓉、潘毅、林春、韩东屏、柏棣、巩献田、恽仁祥、严家祺、卢荻、顾秀林等人，此外还有大批高校教师、左派活动者、海外华侨、学生、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其他普通群众。

刘：联署的人当中是否知识分子居多？

联：不是这样。我们正好对 300 位联署的人所提供的公开信息进行了分类。这 300 个人中，有 198 位公开了信息。在这 198 个人中，高校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占 34%，普通知识分子（教师、民间学者）占 7%，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占 24%。在这 198 个人中，国内有 126 人，国外有 58 人。在 126 位国内人士中，有 30% 是工农群众。此外，国内还有 102 人没有提供信息，我们估计当中大多数是工农群众。所以，参与联署的人，知识分子不少，但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总计：300															
国内	228	职业不明	102			海外	72	职业不明	14						
				有职业信息的	126					工人	33	有职业信息的	58	高校知识分子	21
										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	30			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	17
										高校知识分子	21			高校学生	17
										普通知识分子	12			普通知识分子	2
										高校学生	8			左派活动者	1
										自由职业者	6				
										农民	5				
										左派活动者	5				
										公务员	4				
										退役军人	2				

刘：你们觉得公开联署的效果如何？

联：进入公开联署阶段之后，我们通过红中网、人文与社会、普罗人人网主页对名单进行更新。公开联署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一是起到了鼓动群众的作用，二是团结了一些体制内的进步力量，三是增加了公开信的可信度，使那些原本对公开信嗤之以鼻的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正视这封公开信了。与此同时，一些主流网站也开始刊登我们最初的五人签名版。不过恰恰在这时，有关部门禁止了对公开联署的公开信的传播。这也从反面说明，公开信的影响发生了质的飞跃。

刘：是的，14日上午以后，只有我们红中网能够更新公开联署版，当天人大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你们对此感觉意外吗？

联：并不意外。我们能在三四天之内掀起一个高潮，虽然注定不能力挽狂澜，但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关注撤销铁道部之后的情况。目前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主要的工作一是继续更新公开联署名单，二是在建立关注铁路私有化问题的小组，三是与几个朋友商议对铁路系统改革进行社会调查，四是计划发布一些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章，详细说明撤销铁道部的错误。

刘：说到经验教训，你们在这几天中的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联：这个问题我们几个同志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觉得，经验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公开信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是因为我们立场站得对。铁道系统的公司化、市场化、私有化必然导致票价上涨、事故增加、工人下岗、腐败恶化和国有资产流失，最后是国家受损、人民受害、工人受罪。对这样的事，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地反对，不管这个方案背后站的是谁。同时，我们也光明正大地和左派知识分子、体制内进步力量站在一个战壕里，不怕别人说我们保党救国。

第二，公开信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还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公开身份。公开身份体现了我们的真诚态度，而且说明反对撤销铁道部光明磊落，从而吸引了群众、左派知识分子、体制内进步力量来支持我们。公开信事件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作为一支力量出现，而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各阶级的代表。

第三，通过公开信，我们了解了有关部门对反对意见的管控程度。大规模的公开联署有利于扩大影响，但也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所以公开联署适合在关键时刻抛出，而不宜在一开始出现。同时，不同版本的公开信增加了有关部门的管控难度，因而也有助于传播。

第四，关于公开信的内容和语言，许多人向我们提出了意见。既有恶意的，比如人人网上许多人回复，说博士写出来就这种水平？也有善意的，比如严海蓉等人建议我们多分析一下负债、腐败等问题。还有一种也是善意的，认为公开信太长了，不适合群众看，或者认为语言不够坚决犀利，道理太多。公开信要得到各个阶级的支持，内容和语言必须迁就，不能太长、切忌学术、但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一个办法是，公开信多准备一些版本，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

第五，我们的反对行动需要长期化、组织化。可以设想，铁路系统在未来几年将矛盾丛生，并且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诟病，既是群众斗争的舞台，又是教育小资产阶级的大教室。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社会调查，经常性发布文章，批评铁路总公司的弊端，保持国内对铁路系统的关注。

最后说说教训。主要的教训是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从公布到人大通过只有 5 天时间，但是，2 月份十八届二中全会已经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要政企分开。对此，我们应该在几周前就做好准备。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遗产不多，每一次针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我们都应该有历史使命感进行回击，在每一次回击中发动群众、锻炼队伍、团结各阶级。

**刘：谢谢你们接受红中网的采访！**

**联：也要谢谢你们。在此我们也借你们红中网向所有支持过我们的网站表示感谢，向所有帮助我们宣传公开信的人们表示感谢！**

## 红色中国特别时评：历史将宣判薄熙来无罪！

（2013年7月25日）

新华网报道，薄熙来所谓“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已经由伪济南市检察院向伪济南市中级法院提起所谓“公诉”。显然，掌握中国政权的汉奸买办卖国集团对薄熙来同志的迫害是不会到此为止的；他们将按照他们预定的计划进行所谓审判，无限期地关押乃至杀害薄熙来同志。对于汉奸买办卖国集团强加于薄熙来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广大的爱国进步力量以及正义的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承认；对于他们迫害薄熙来同志的罪行，或迟或早，人民都必然要予以清算！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即所谓“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进了死胡同。在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反动已经日薄西山的大形势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仍然叫嚣“停滞和倒退，就是死路一条”，这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决没有好下场！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迟或早，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必然要严重地破坏生产力，必然要极大地激化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仅仅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日本、美国、欧洲，概莫能外，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三十多年了。物极必反，早已经量变到质变，危机的能量已经充分积聚，资本主义经济大厦的坍塌已经为时不远了。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所谓“改革开放”每向前推进一步，贫富分化就上一个台阶，人民的苦难就加重一分，越来越多的“中国梦”就支离破碎。然而，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越是“攻坚”、越是靠近“深水区”，人民群众就是越是觉醒，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就越是增长，广泛的进步和爱国力量就越是壮大。到了本世纪初，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中国的汉奸买办卖国力量害怕了，胆寒了。

这些年，中国又回到了“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时代。全中国的官不要说“为人民服务”，能少坑害劳动人民、少卖国，老百姓就烧高香了。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薄熙来同志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是很不容易的。重庆人民要记住他！全中国人民要记住他！愿意拥护他做我们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汉奸买办卖国势力、一切反动派才必要致他于死地。

从眼前来看，中国的汉奸买办卖国集团是有力量的。他们有财富、有政权、有媒体、有警察。然而，他们正在丧失民心，他们已经丧失了民心！古人尚且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是经历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中国人民！

在这样的危如累卵的形势下，还要“审薄”，还要搞金融自由化、铁路私有化，中国的资本家们、茅于軾们、李庄们、温家宝们、胡德平们、邓朴方们、习近平们，你们是怕危机来得不够快吗？是怕危机来得不够猛烈吗？是怕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正反两方面教育还不够吗？是嫌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统一战线还不够广阔吗？

当年，蒋介石张牙舞爪，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匪军悍然侵犯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自以为得计。毛主席当时就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

今日，所谓“改革开放”也已经日暮途穷，汉奸买办卖国集团垂死挣扎，欲以非法审判薄熙来、全面私有化两项办法，进一步剥削压迫人民，加强自己。这无非是中国的汉奸买办卖国集团的回光返照罢了。中国的全部的进步和爱国力量以及越来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地反对非法审判薄熙来。非法审判薄熙来之日，便是汉奸买办卖国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

不审薄熙来，汉奸买办卖国集团尚可以留有后路。审了薄熙来，就是断了自己的一切后路。一旦危机爆发、大厦将倾，一旦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普遍觉醒，能不要求清算一切贪官污吏以及黑资本家吗？能不要求立即平反薄熙来并拥护薄熙来做自己的领袖吗？一切参与迫害薄熙来的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能不向人民认罪伏法吗？这不过就是未来五至十年的事情。

在美帝国主义走狗、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法庭上，年轻的卡斯特罗曾经豪迈地宣布：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无论死心塌地追随美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汉奸买办卖国集团如何猖獗一时，历史都必将宣判薄熙来无罪！

（撰稿人：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

## 左派力量到底有多大？

远航一号（2013年8月6日）

在多维论坛上看到安玛推荐的署名马小飞的一篇文章——“薄熙来案的政治陷阱：反薄就是与13亿为敌”，其中说到，全国13.5亿人，其中13亿弱势群体都拥护薄熙来，而反对薄熙来的权贵富豪、西化派、法律党等不过5000万人。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这样来估计挺薄和反薄的力量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事实是，相当多数的人民群众目前仍然处于政治上不觉悟、不参与、不组织的状态；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势力却掌握着生产资料、金融财富、媒体、军队和警察。所以，在表面上，资产阶级、汉奸买办卖国势力确实显得很强大。目前要组织大规模的挺薄群众运动，也确实时机不成熟。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左派，即反对汉奸买办卖国势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派别，到底有没有力量？有多大力量？力量在哪里？

我回国期间曾经与一位同志探讨。他提出一个标准，他估计全国的左派骨干大概不超过5万人。他的根据是2011年乌有之乡发起的声讨茅于軾运动，经过较长时间的宣传动员，最后参与签名的大约5万人。从短时间的动员能力来看，今年上半年，红色中国网发起过反对铁路私有化的公开信，有300多人签名。主要是与红歌会网相联系的左派同志发起过揭露南方系以及狙击茅于軾的群众性街头运动，参与者约几百人。

当然，近年来，各地曾经多次举行过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性活动，全国累计参加的人次应有几十万人。去年，全国各地曾经爆发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参加的群众可能有几百万，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和标语是由左派主导的。

综合来看，目前全国范围来说，有一定思想水平、有一定活动和组织能力、比较经常和积极参加左派活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估计至少有500人，不会超过5万人，合理的估计值大约在5000人上下。

从长远、根本来说，全国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全国人口的 80-90% 可以成为左派的潜在群众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时期，甚至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处于比较被动、比较麻痹的状态。

如果我们具体地分析，工人阶级中有过社会主义经历的“老工人”，是左派的第一个基本的群众基础。九十年代时退休下岗工人约 5000 万，加上家属约 1 亿人。这部分工人阶级，经历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两个历史时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比较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从自己或家属的亲身经验中了解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拥有与新工人相比以及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高的阶级觉悟。近年来，在老工人的实际斗争中，产生了一批有马列毛觉悟的工人阶级政治积极分子。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贫富两级分化的加剧，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因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和地位方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由过去的自由派一统天下发展到现在自由派、民族主义和左派三分天下。其中，民族主义正在逐步向左派靠拢。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队伍有多大？2011 年，中国的国企、外企和股份制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为 1 亿 4000 万。如果再加上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7000 万，那么城镇有比较正规就业的人口大约有 2 亿人。如果其中一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一般社会上所谓的小资、白领、中产），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相加就是 1 亿人，加上家属可能有 2 亿人。如果其中资产阶级有 5000 万，小资产阶级就有大约 1 亿 5000 万。其中，可能有 5000 万属于进步小资产阶级。

这样中国左派目前在社会上可以依赖的基本群众，包括老工人及其家属，再加上进步小资产阶级，大约是 1 亿 5000 万，占整个人口的 10% 强。如果去掉人口中没有政治活动能力的少年儿童和高龄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约 9 亿 4000 万）相比较，则不到六分之一。如与城镇人口 7 亿 1000 万人相比较，则约为 20%。这个估计，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曾经有一个社科院的调查，认为有四成民众持左派政治倾向。这可以看做是左派目前群众基础的上限。

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时期，左派能取得这样的群众基础，这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我们可以与 1989 年之前自由派在全国的政治动员能力以及群众基础相比较。1989 年之



前，在 1987 年，曾经有若干地方爆发过自由派领导的学生游行示威，规模大约在几百人至几千人。1989 年之前，像在北大那样的地方，虽然老师、学生普遍受自由派思想影响，但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政治积极分子估计也就是二、三十人。加上社科院、党校、政法等地方，整个北京的自由派政治积极分子估计在 50 至 100 人左右。北京的政治活跃程度要大大超过全国其它地方。所以当时自由派在全国的政治积极分子可能也就是 1000 至 2000 人。也就是说，左派目前在全国的政治积极分子数量有可能已经超过了当年的自由派。

就社会上的群众基础来说，当年的自由派在农村是毫无政治影响的。1989 年的政治运动，农村完全没有参与。1989 年时，城市人口不到 3 亿，占全国人口 26%。工人阶级只有极少数参与了 1989 年的“民主运动”。大多数工人虽然受到自由派思想影响，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复辟是抱怀疑态度的，因而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自由派的主要社会基础还是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部分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大约也就是五分之一甚至更少。知识分子、大学生，加上其他受较多自由派思想影响的群众，可能也就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弱。

当然，以上这些，说的都是社会“承平”时期的情况。1989 年的经验证明，一旦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出现了革命形势、革命高潮，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可以发生迅速的、激烈的变化，反政府的政治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当然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退）。1989 年，在最顶峰的时候，自由派有可能在全国的主要大城市具备了动员一半左右城市人口的能力。

根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左派的政治未来，我们可以做哪些估计呢？首先，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以依赖对廉价劳动力剥削为基础、以出口制造业为核心的半外围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必然严重的依赖外国的技术、市场和能源原材料；决定了中国的阶级矛盾和环境资源矛盾必然特别尖锐；也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必然具有相当的买办性和对外投降的性质。这些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五至十年）爆发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当这种危机爆发的时候，政治形势就会发生与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相当不同的变化。首先，在危机时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将大幅度下降，相当一大批资本家将亏损、破产。这样，相当一大批资本家将无法再作为资本家存在下去，而那些仍然勉强维持的资本家也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就业失败、大批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将使社会上的一大批劳动力无法进行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入长期的、全面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将会很快面临财政收入萎缩的问题。一方面，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府的各种正常职能仍然要维持，资本家还会要求减税和补贴。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会引起全面的财政危机。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将很可能被迫缩减各种社会开支，比如教育、医疗、有社会补助的住房、社会保险以及环境保护。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很大一批群众的切身利益。综合这些因素，中国就会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将出现革命形势。

现在，在左派中仍有不少人担心，一旦中国乱起来，自由派将趁机夺权并实现改旗易帜。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中国现在的政权就是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中国未来的危机，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不管哪个阶级，不管哪种政治力量，不管它是掌握军队还是掌握媒体，如果它不能够解决未来的危机，是不可能在今后的政治角逐中胜出的，或者即使得逞一时，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如埃及的穆尔西、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四一二后的蒋介石）。

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剥削、依靠掠夺资源和环境的出口制造业资本主义再也走不下去了。或者，中国的资产阶级能有什么神机妙算能够不依靠廉价劳动力、不依靠掠夺资源和环境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中国的危机只能通过资本主义之外的办法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现实是，中国现有的阶级矛盾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连在局部地区打黑都不能容忍，更何况是废除廉价劳动力积累模式。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自由派主张民主、自由、宪政将会对很多群众有吸引力，甚至有些同志认为，左派只有先跟着自由派搞“民主革命”，政治上才有出路。这是政治上的短见。民主不能当饭吃。无论未来自由派在政治上能否昙花一现（存疑），只要他们解决

不了人民群众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人身安全等实际问题，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垮台。

全国左派现在拥有的政治积极分子有几千人之多。经过几年的发展，达到一万人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万人，分布在全国，就有可能在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大中城市，各集中一两百人。这个政治密集度，就超过了 1989 年自由派在北京的政治密集度。

未来的具体的政治斗争形势是不可能预料的。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可能像 1989 年，也可能像埃及。无论如何，革命高潮的一个基本特点，便是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中，很多将会是政治运动，但是也必然有不少是围绕着具体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群众运动。革命高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运动的共同作用下，资产阶级统治将陷入瘫痪和瓦解。这将表现在，地方政权失控，无力镇压当地的群众运动；在若干地方，群众夺取并直接掌握政权。这还将表现在，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军队发生动摇，上层矛盾白热化、公开化。

如果左派届时能够在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地方集中相当数量的政治积极分子，就完全有可能积极全面参与、影响直至领导当地的群众运动，并在群众运动夺取政权时趁势夺权。

到了那时，无论左派是否能在初期取得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现实的政治、经济形势将逼迫所有的群众运动以及地方政权左转。一切地方政权要生存，首先要有财政收入，其次必须要能维护地方秩序。当资本主义危机来临的时候，工商业资本家纷纷破产倒闭，无法再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来源。另一方面，现在在各地普遍存在的警匪勾结、依靠黑社会维稳的社会统治模式将土崩瓦解。

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将首先铲除地方黑社会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资本家（即重庆模式！）。接下来，为了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除了惩办一些最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将别无出路。但是，在打了“浮财”以后，要解决持久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问题，就只有靠发展公有制企业。政治上有利和必要时，可以先通过清算历史上的非法私有化，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积累“第一桶金”。

只要形成了上述的政治局面，左派就完全可能掌握危机来临时全国政治变化的主动权，并进而取得全国范围的优势。

## 薄熙来与中国人民的最低共同纲领 —— 兼答木水同志并谈左右合作问题

远航一号（2013年8月29日）

数日前，木水同志就当前挺薄斗争形势向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和红色中国网友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红色中国网编辑部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在这里，我谨代表编辑部的其他同志感谢木水同志对红色中国网的鼓励与支持。

木水同志建议，以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名义邀请薄熙来同志作为我们的名誉主编，这是木水同志给予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巨大信任，我们表示感谢，同时又受之有愧。

薄熙来同志是目前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伟大的政治家，为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与薄熙来同志的功绩相比，红色中国网做的工作很少、很有限。红色中国网应保持其目前的形式，作为一个由信仰马列毛的革命与进步分子自愿结合的网站，推进马列毛力量的发展，推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推进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坚决支持包括挺薄斗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进步与革命事业。

过去一年多的斗争实践表明，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实践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经过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薄熙来同志的重庆实践，发生在这些矛盾将要爆发但尚未全面爆发的历史时期。

在重庆，薄熙来同志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切实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和措施。这主要表现在：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以国有资本积累带动私人资本积累，即所谓“国进民进”，而不是（如其它各个省市那样）将国有资本分光卖光，造成了较为良性的资本积累模式。实行“三进三同”，利用其个人影响力以及一定的群众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国家机器，并以此为依托，发起打黑运动，沉重打击了地方黑社会以及依附地方黑社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切实保障了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其它地方纷纷将土地廉价卖给资本家、官商勾结共享房地产大餐的时候，重庆能够将储备的土地资源切实转化为财政收入，同时通过廉租房建设等办法，将一部分利益转让给当地劳动人民。通过唱红运动肯定了中国革命，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压制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实际上即提出了通过收入和财富再分配、迫使资产阶级让步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政治纲领。

薄熙来同志所领导的政治实践，在形式上是改良，即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然而，过去一年多的政治斗争表明，正是这些形式上

是改良的政策和主张，已经为包括官僚集团、买办集团以及与上述两个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私人资本家集团在内的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容。这样，薄熙来同志的政治实践与政治主张就有了伟大的革命的意义。

革命导师曾经说过，革命爆发的条件，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换言之，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统治阶级可以让步的最大限度，因而阶级矛盾已经绝对不可调和的时候，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革命就是必然的了。

薄熙来同志所领导的政治实践，在重庆，得到了老工人的支持，得到了新工人的支持，得到了作为半无产阶级的农村劳动者的支持，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普通技术人员、普通公司职员、普通自由职业者和小业主）的支持。反对的，只有黑社会、资本家和政府官僚。这就是说，薄熙来同志的政治实践满足了重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基本、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而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竟然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不容。这就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或者正在开始丧失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基本、最低限度要求的能力。

经过过去一年多的政治斗争，特别是经过过去几天薄熙来同志在反动派法庭上的斗争，薄熙来同志正在成为当今中国一切进步力量所公认的政治领袖。薄熙来同志成长为这样一个领袖，其实际的历史意义就是，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最低限度要求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大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正在形成一个十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改革开放”、争取社会主义方向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内容和主张，目前还不清晰，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必将日益清晰起来。

中国革命的形势目前尚未到来，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积累仍然在进行，一般劳动人民的劳动力再生产仍然得以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仍然得以维持。然而，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我们的理论武器、参考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参考历史上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在未来的七八年或者稍长一点的时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这些条件将全部丧失。到了那个时候，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就将全面地、公开地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无能为力也将全面地、公开地暴露出来。

未来的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就必然要遵循它自身的逻辑，就必然要突破资产阶级社会正常统治时期强加于人民的各种条条框框，就必然要指向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胜利。

在这次挺薄斗争中，有一些站在右派立场的朋友也参加了。挺薄阵营内部也有所讨论，那就是，挺薄斗争与中国人民一般的争取民主、政治自由或曰所谓争取“宪政”的斗争是怎样的关系。这种争取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斗争与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反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是怎样的关系？马列毛左派与自由派在政治上合作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我个人认为，关于民主、政治自由、宪政等问题，与挺薄斗争一样，必须服从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目前与将来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特别是在未来革命形势下必然要表现出来的要求。

我个人认为，这些要求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私人资产阶级通过巧取豪夺，通过侵吞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积聚了巨大的非法财富。对于这些通过非法私有化积聚起来的财富，特别是其中的罪大恶极者，必须清算，收归人民所有，由人民处置。

第二，中国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不仅是通过非法私有化积聚起来的，而且是通过长期的、持久的、大规模的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建立起来的。这种残酷剥削，包括了血汗工厂、黑社会以及偷税漏税等违反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正常法律和道德的各种黑暗手段。为此，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向包括私人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讨还历史欠债。在过渡时期，在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除了清算非法私有化以外，包括中国私人资本家在内的一切资本家都应该放弃一部分他们过去通过非法手段积聚起来的收入和财富，以换取他们在过渡时期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自由。

第三，放手发动群众，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前提下，对国家机器进行初步的改造；清除那些与资本家和黑社会长期密切勾结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为群众所信任的革命干部。运用经过初步改造的国家机器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监督资本家遵纪守法，打击并消灭黑社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各项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第四，在上述三项条件实现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在自由、公正的条件下，通过民主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产生宪法。由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意愿或者抽象的“普世价值”来决定宪法的基本原则。通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即大民主或曰“多数暴政”的办法，来确保宪法的实施。

以上这些，在我们看来，将是未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将要产生的最低共同纲领。我们愿意与包括自由派朋友在内的一切政治派别探讨这些纲

领。如果自由派朋友们愿意接受这些纲领，我们可以考虑与自由派朋友在这些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与可能的政治合作。



## 与红二代“拭目以待”谈“江山”

远航一号（2013年9月13日）

编注：在温故而知新先生“习近平倒了谁上”一文后面，拭目以待“大姐”跟贴表态。拭目以待大姐是多维论坛上著名的“红二代”，据说父辈曾经跟着毛主席打过天下。在国内期间，曾经听一些“通天”的朋友表示，“红二代”人士往往骄傲得很、狂得很。笔者无才无德，不曾与红二代打过交道，只是在成都与两位沾红二代边的人士打过交道。果然名不虚传，骄傲、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怕“乱”，决不允许“乱”，“乱”了就一定是引狼入室，一定是右派掌权，一定是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总之，劳动人民只有靠他们红二代或红二代“沾边”才有盼头，他们要完蛋了，中国人民也必须完蛋。拭目大姐的精神、派头也是这般。于是将拭目大姐的跟贴“请”过来，附上本人的评语，供红色中国读者品评吧。

还是想借此机会忠告一下各位“红二代”朋友，毛主席早就批评你们是“八旗子弟”，不要以为这是夸你们。你们现在的形势是危如累卵，“宁无一人是男儿”。薄熙来尚且保不住，岂能保江山？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架子，虚心地、诚心诚意地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与谅解（不要忘了，搞资本主义复辟，你们也是有份的！），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到了今天，还不审时度势，还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那就叫不识时务！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你们，中国人民都要推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与人民大众一起走光明正道，还是死守着资产阶级的破船甚至在沉船前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钞票（比如你们亲爱的习总），你们自己看着办！

**拭目以待：**

习薄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都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倡导者。倒薄就是倒习，倒习就是乱中华！谁要想借挺薄的名义，散布谣言，歪曲事实，与独轮运联合，挑拨习薄关系，恶毒人身攻击，咒骂侮辱举世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谁就是居心险恶，一心投靠温奸贼，妄图搞乱中国的汉奸、卖国贼！

今天的红色江山是我们的父辈、与共产党鱼水相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一切的老百姓和无数革命先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夺取的。谁要拼命鼓噪、攻击、梦想联合外敌推翻中国，妄图让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全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与这些卖国贼刺刀见红，拼到底！让这些汉奸、卖国贼死无丧身之地！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news.com/post-361617.html>

### 远航一号：

拭目前辈，中国的大好河山不是你们父辈的，更不是你们的，主席也不敢说是他的，而是中国人民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主席领导文革，就是为了反对你们把天下变成你们的家天下，就是为了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

你们红二代离开了劳动人民的支持，就是无水之鱼、无缘之木；到了今天还不反省，会有前途吗？

薄熙来同志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无论他是否共产主义者，他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对人民有利的，他在历史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地位，并且必将有更加光荣的地位。

至于另外一位，说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那是对“共产主义”这个词的侮辱。如果你和那位说得上话，不妨直言，我们对他做好事已经不指望，劝他少做坏事吧，少做梦、多面对现实。不是为了国家人民，实在是为他自己考虑。

审薄是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事。私有化、自贸区、改革开放，就是最坏的事。据说，他去人民大学，曾经很动感情地对人民大学教师说“你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很不容易”。既如此，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知，不至于对资本主义危机、两极分化、必然灭亡的原理完全无知，不至于对立刻抢勾结帝国主义、国际资本祸国殃民的实质完全无知。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坏事做绝呢？

他不如薄，要承认，不要嫉妒。妒令智昏，越是位高权重，后果越严重，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个人越危险。

知道您一向脾气不好，稍欠雅量；顺便劝您少生气，莫伤身；你们的“红色江山”还要靠你来保呀。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news.com/post-361617.html>

##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能存活多久

### 红色中国时评（2013年9月23日）

原编注：这一期红色中国时评是在一个黑暗的日子写下的。9月22日，将与9月18日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刻骨的、纪念民族耻辱的一天。在世界历史上，非法审判薄熙来将与国会纵火案一样臭名昭著。然而，它的长远影响或许可以与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相比较。德雷福斯案件的始作俑者，当时主宰法国政局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各色保皇党人，最终伴随着德雷福斯的平反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历了1789年以来一百多年的斗争以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终于得到了巩固。薄熙来同志今日蒙冤，不过是为薄熙来同志来日上升为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准备了必要条件。薄熙来同志今日被判处所谓“无期徒刑”，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此也就判处了自己的死刑。

自2012年3月以来，红色中国网始终坚持站在支持薄熙来同志宣传斗争的前线。作为一个马列毛网站，红色中国网认为，支持薄熙来同志的斗争是更广泛的无产阶级以及人民大众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红色中国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胜利。这是我们网站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我们不仅是在口头上相信，而且是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充分占有事实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观点、证明我们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无论过去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始终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

在本期时评中，我们将继续本着这种乐观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精神，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

英国《金融时报》于9月2日发表长篇社论，提出“中国共产党还能存活多久”的问题。根据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文章认为“中共已具备了所有灭亡的因素”。“现代化理论认为，专制主义制度往往随着收入增加而民主化，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加速这个过程，并且在长期快速增长之后的经济放缓使得这种转变更加可能。严重恶化的不平等加上高度腐败可以增添变革的动力。所有这些因素现在存在于中国。”

《金融时报》认为：“有一个可爱的历史巧合是，没有一个专制政权，除了墨西哥，在主办现代奥运会之后能够继续维持十年。想一想 1936 年的柏林，1980 年的莫斯科，1984 年的萨拉热窝，和 1988 年的汉城。现在距离中共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五年。”

《金融时报》所提出的问题，是真实与重要的。然而，与《金融时报》不同，我们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只有首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谈得上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或其它理论。我们同意，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面临着重大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的对象将不是“中共专制政权”或者不简单的是“中共专制政权”，而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后者（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正如我们在以前的时评以及其它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在党内走资派于 1976 年反革命政变夺取政权之后，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系列的阶级斗争，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重庆改良的失败、薄熙来被迫害、李克强政府加紧金融私有化以及若干重要行业私有化等事件，并不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趋势以及性质。这些事件不过是表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已经最后放弃了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下决心全面推行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在国际上，则是下决心决不挑战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而是全力充当“负责任的大国”，帮助日薄西山的美帝维护日益不可收拾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当然，在各种具体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与他们共同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相比是枝节的、次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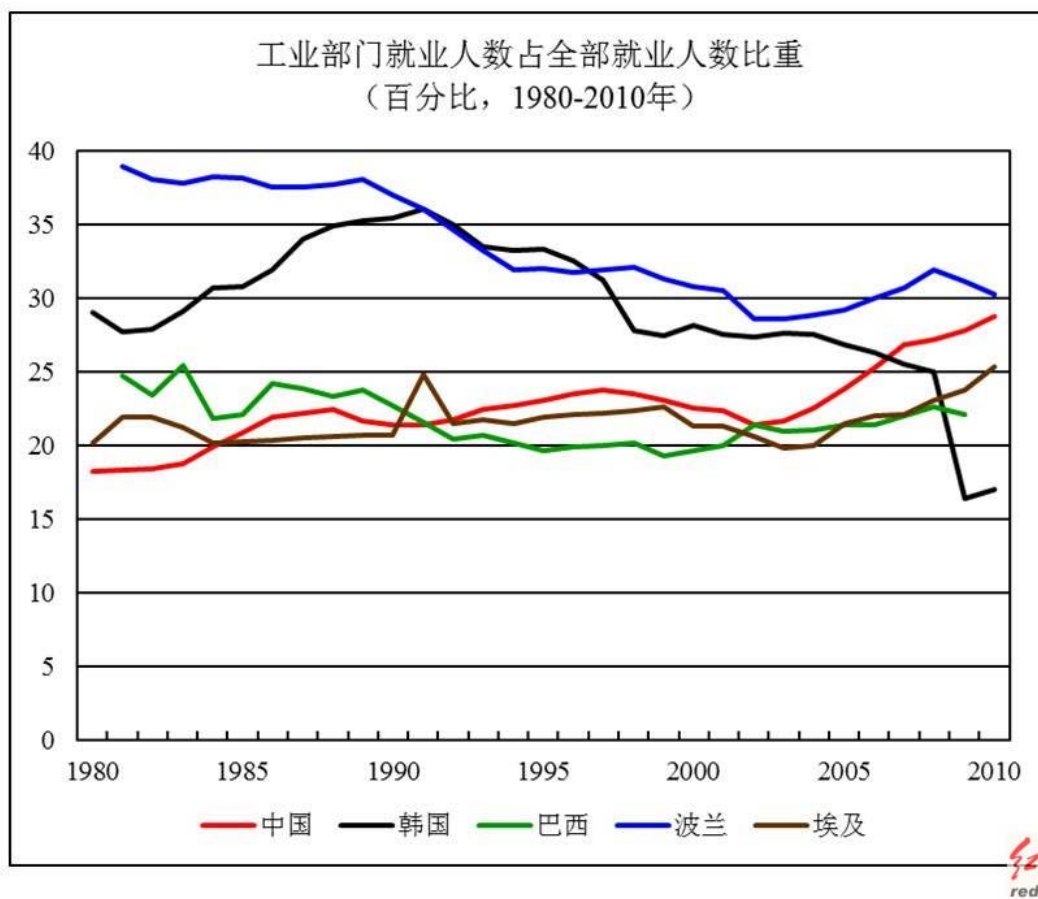
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大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并不是如反动的自由派以及一些左派朋友所认为的是什么“一党专制”，也不是什么“国家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所谓“一党专制”或者“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方式，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外围与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方式，比如我国台湾省、南朝鲜、新加坡以及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曾经流行这种方式。至于由少数几个家族同时控制最高政治权力以及

大量经济财富的情况，更是在各种各样的外围及半外围国家（无论是“一党专政”的还是“多党民主”的）屡见不鲜。我国的近邻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均属于这种情况。所谓“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政府的腐败也很严重。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腐败、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既不属于最严重的，也不属于最恶劣的。那种动不动就将中国资本主义说成是“最坏的”（包括不加分析地照搬毛主席的某些话），无非是有意无意地在人民群众中制造这样一种幻想——一种“更好”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并且是值得期待的。

要正确分析中国的以及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必须正确认识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能不能正确分析、认识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区别马列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区别真假马列毛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准。中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方面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承担的分工职能是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由于这个基本特点，这就进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另外几个特点。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对广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来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所谓“竞争力”。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必须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特别是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的持续快速扩张。第三，中国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有赖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提供越来越多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如果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两个或三个不复存在了，中国资本主义现有的积累模式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现有的积累模式不能维持下去了，而又没有其它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来替代它，那么，中国未来的危机就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内得到解决（无论是“一党专政”的还是“多党民主”的资本主义），而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图一

## 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化

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而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图一比较了中国与韩国、巴西、波兰、埃及等国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这几个国家是与中国有一定可比性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都爆发过大规模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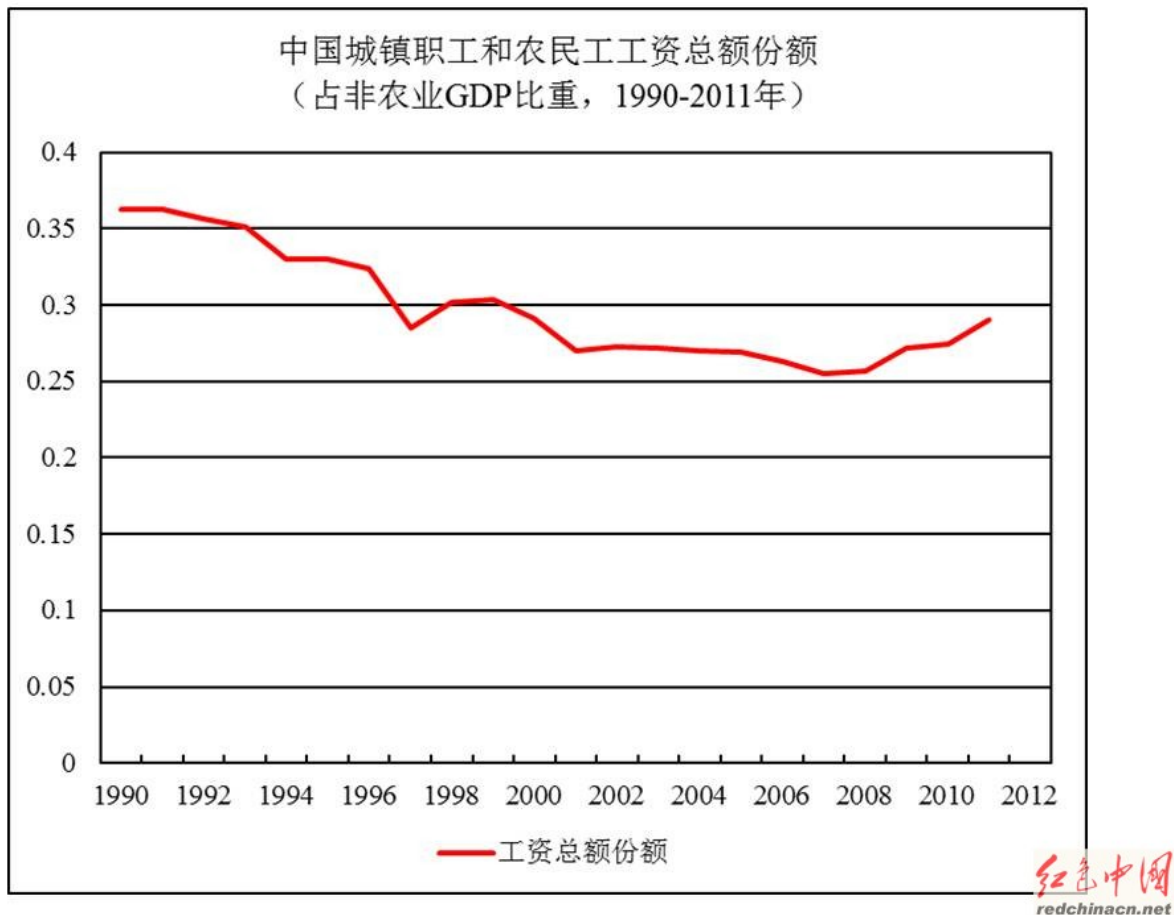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比重已经显著超过除波兰以外的其它各半外围国家。从2003年至2010年，中国的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比重从22%增加到29%。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专门从

事出口制造业的性质。按照这样的速度，至 2020 年，中国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比重将增加到约 40%。

相比之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波兰爆发大规模工人运动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比重不到 40%。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韩国爆发大规模工人运动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比重在 30%-35% 之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业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由于工业无产阶级在生活场所和生产场所高度集中，又受到了比较良好的现代教育，有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觉悟，因而在工业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独立的、足以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

中国资本主义过去几十年的“繁荣”依靠的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农村的剩余廉价劳动力已经开始枯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虽然仍是资产阶级占优势，但是已经初步出现了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中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以及工人工资总额在中国整个经济产值中份额的增加。图二说明了 1990 年以来中国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工资总额占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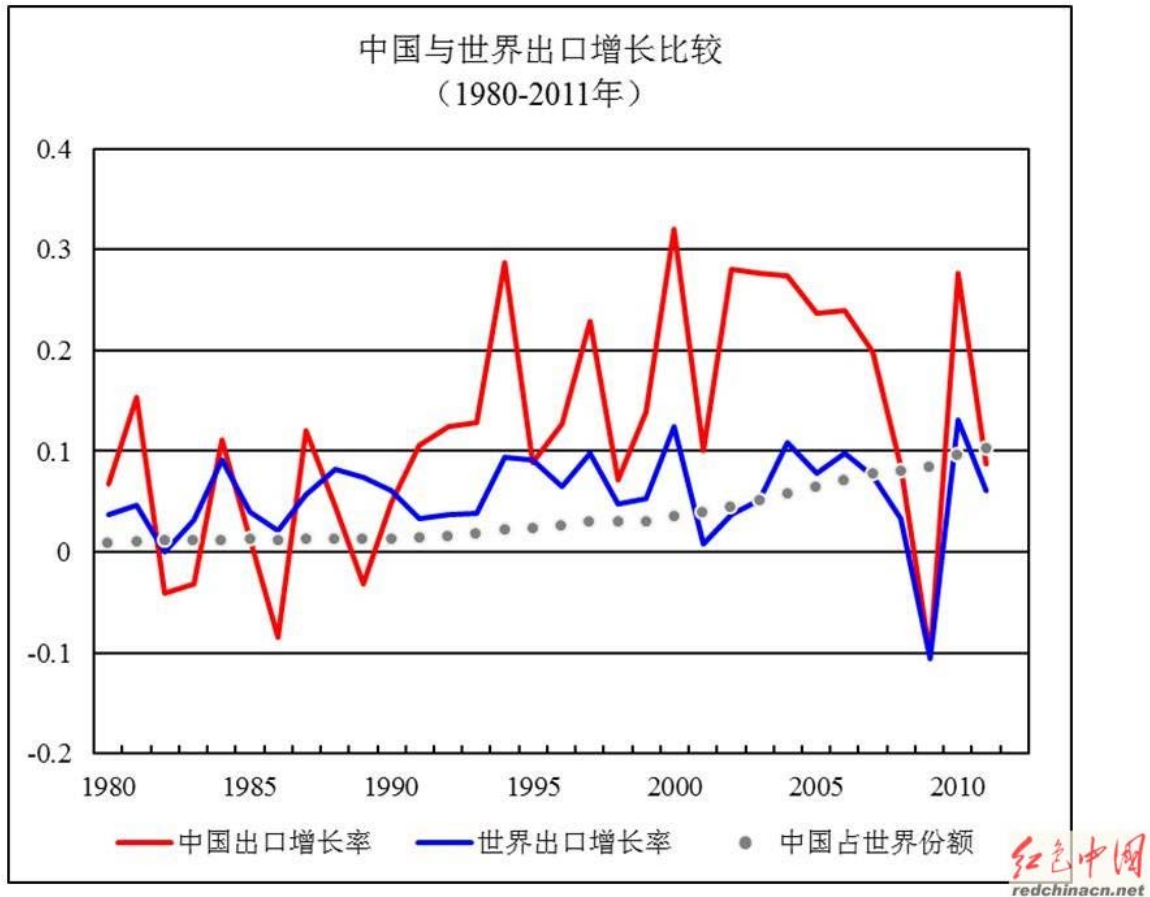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大规模私有化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极大地削弱了城乡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斗争力量，导致工资总额（含城镇单位职工、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和外出农民工；假设外出农民工全年就业；不含本地农民工）占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自 1990 年的 36% 下降到 2007 年的 26%。

然而，自 2008 年以来，工资总额份额连续数年有所增加，至 2011 年已经上升到占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29%，平均每年约增加一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至 2020 年，工资总额占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望达到 40%。这将大大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加速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

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可以预期，中国工人将提出广泛与全面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些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将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以剥削广大廉价劳



动力为基础的积累模式。



图三

###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出口导向积累模式的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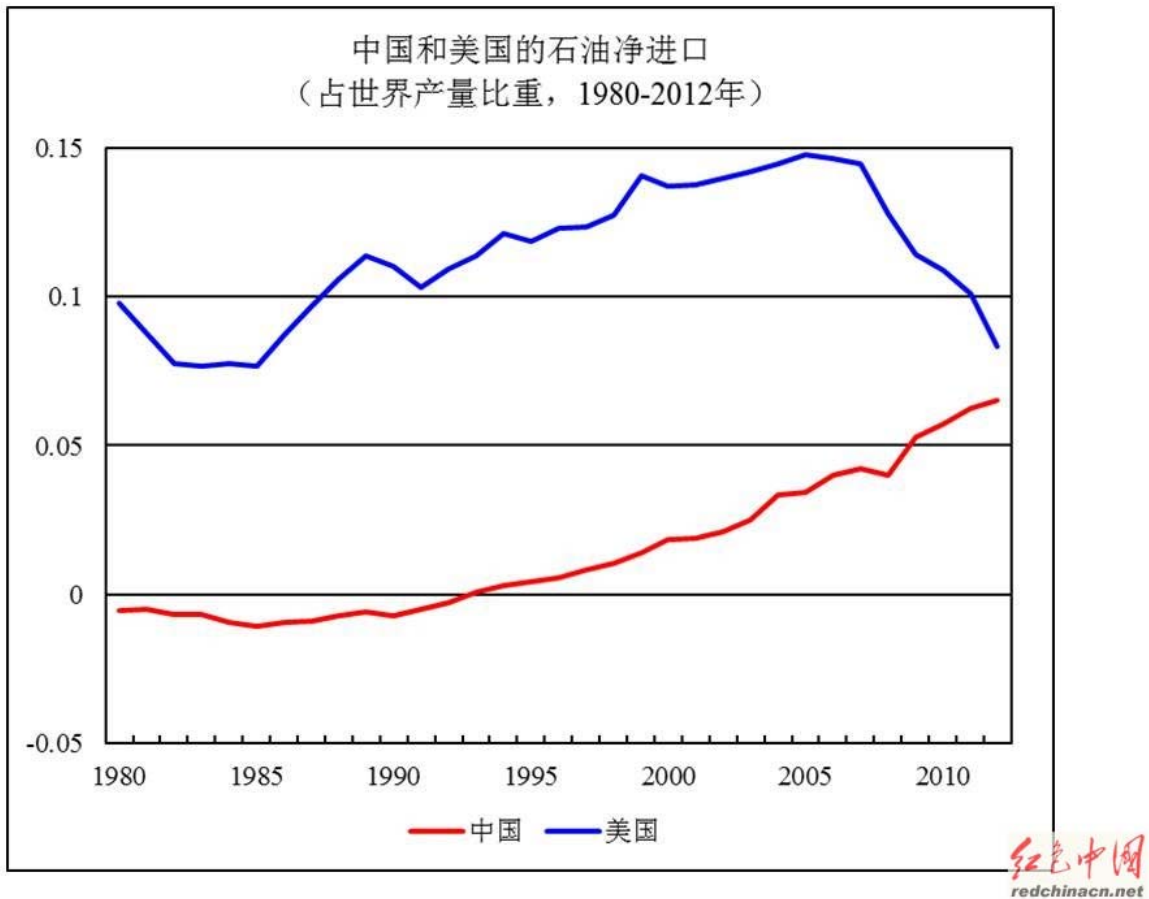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保持强大的出口竞争力是改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来说，只有保证出口高速增长，才可能进口大量的中心国家（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并满足统治阶级对各种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从而保证本国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各

国纷纷依靠低工资、低税收进行恶性竞争，出口高速增长还可以弥补本国消费需求的不足，确保“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张。

图三比较了 1980 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平均的历年出口增长速度（出口增长速度按照 2005 年不变美元计算）以及中国占世界总量的份额。

如图所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全面推行私有化以及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进入了出口高速增长的时代。1990 年至 2011 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 16.6%；同期，世界出口年平均增长 5.9%（均按 2005 年不变美元计算）。中国出口的高增长保证了中国年均约 10% 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按当期美元计算），由 1980 年的 0.9%、1990 年的 1.3%、2000 年的 3.5%，增加到了 2011 年的 10.2%。显然，中国的出口份额不可能无限上升。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既不可能占领真正高技术产品的市场，也不可能占领各种资源型高价值商品的市场。根据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以 20% 作为中国占有世界出口市场的上限。按照 2000 年以来中国出口份额增加的速度，至迟不超过 2030 年，中国将达到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的上限。考虑到未来世界出口增长率将趋于下降，届时，中国出口的增长率将下降到 2-3%。



图四

### 石油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困境

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生产中心，中国经济必须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其它矿产资源。为了满足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美国梦”，让中国的城市“中产”过上准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特别是石油）。

图四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历年石油的净进口（按照石油消费量减产量计算）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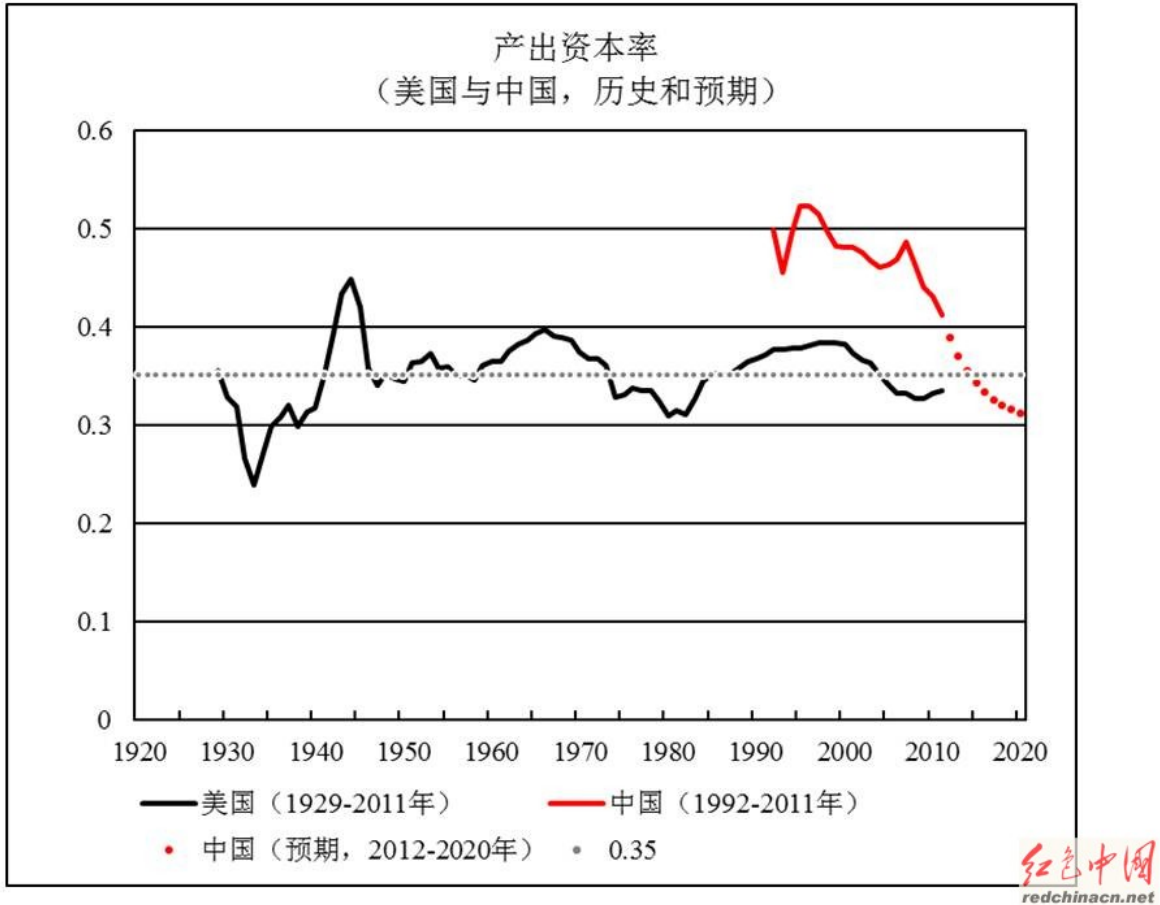
1993 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1985 年，中国的净出口量达到最高峰，日均净出口约 60 万桶，占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约 1%。2000 年，中国日均净进口石油约 140 万桶，占世界石油产量的 1.8%。2012 年，中国日均净进口石油约 580 万桶，占世界

石油产量的 6.5%。

美国于 2005 年日均净进口石油约 1250 万桶，占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约 15%，达到历史最高峰。近年来，由于美国页岩油开采成功，国内石油产量大幅度上升，石油进口锐减。按照现有趋势，中国将于今年或明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美国是世界上的霸权国家。美国在最多时得以进口世界石油产量的 15%，依靠的是美元霸权以及美国占绝对优势的海空武力。中国的海空力量以及国际影响目前根本不足以保证中东与中国之间海上航道的安全，更不必说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人民币也不足以代替美元作为新的储备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口石油的实际上限很可能在世界石油产量的 10% 左右，大约相当于日均 1000 万桶。按照现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增长速度，至迟在 2025 年以前，中国将达到石油进口能力的上限。

在 2025 年以后，世界石油产量很可能陷于停滞并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考虑到能源效率提高等因素，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也将由于石油供给的制约而大幅度下降，年均增长率将下降到 2-3%。



图五

### 危机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并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当利润率持续、严重下降，在现有经济制度范围内无法得到恢复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面临严重的调整，就会出现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高潮乃至革命形势。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也不足以恢复利润率以及资本积累的各种必要条件的时候，危机就只有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来解决。

以上各节所论述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最终要通过利润率下降的方式集中表现出来。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统计不够完备，目前无法准确估算整

个经济范围的利润率，可以采用整个经济范围的产出资本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之比）作为代用指标。

图五比较了美国与中国历年的产出资本率以及中国自 2012 年至 2020 年预期的产出资本率。

在美国经济史上每当产出资本率持续低于 0.35 时，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三十年代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 2008-2009 年的“大衰退”都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自 2007 年达到 0.49 以后急剧下降，至 2011 年下降到了 0.41。按照现有趋势，中国的产出资本率将在 2015 年下降到 0.35 以下。假设中国经济在未来可以保持每年 7% 以上的增长率；再假设李克强政府的所谓“调结构”能够起一定作用（目前尚无迹象），从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得以从现在的 45% 下降到 2020 年的 42%，中国的产出资本率仍将于 2020 年下降到 0.31。

资本家的利润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大批资本家破产；表现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系统的坏债和不良资产急剧上升。最终将导致资本家大幅度削减投资；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或者可以轻易规避现有管制的情况下，还将导致资本大规模外逃，从而触发全面的、严重的经济危机。

### **革命的来临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以剥削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为基础的特色资本主义快要走到尽头了。这个尽头虽然还没有到，但是它的来临已经可以触摸到了，走到尽头的台阶已经看得到并且可以数得清清楚楚了。

以中国无产阶级壮大的速度来计算，这个尽头大约在 2020 年；以中国出口扩张的极限来计算，这个尽头大约在 2030 年；以中国石油进口扩张的极限来计算，这个尽头大约在 2025 年；以中国产出资本率下降的速度来推算，这个尽头大约在 2015-2020 年；以现代历史上其它“一党专制”政权举办奥运会以后垮台的纪录来看，这个尽头大约在 2018 年。

那么，中国未来的危机将导致怎样的社会变局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走向资本

主义改良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取决于未来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实际的社会经济关系。

有几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未来的中国政权（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必须面对的。首先，中国社会未来的主体阶级将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必然是无产阶级（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将是工业无产阶级）。所以，任何未来的中国政权必须满足已经壮大了的无产阶级各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这既包括足以提供有尊严生活水平的工资、劳动条件的极大改善、工人在劳动场合所应有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也包括无产阶级所必然要求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权利（除了政治民主以外，还包括由国家给工人提供的在失业、养老、疾病等方面的各种保障）。总之，如果满足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模式的终结。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果私有制继续占统治地位），在廉价劳动力模式终结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依靠什么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竞争力呢？依靠高技术吗，还是依靠高价值的自然资源？如果两者都不可能呢？

第二，任何未来的中国政权必须有办法解决中国的已经十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在出口竞争力受限制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将有限的外汇资源用于优先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需要以及进口国家经济发展最必需的物资。这只有在大幅度减少石油进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不仅将减少资本家的利润，而且势必与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过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愿望发生严重冲突。

任何左的或右的政府，到时候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不敢触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石油进口需求，将不得不听任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引起国内通货膨胀失控。其实质，就是以剥夺国内劳动人民购买力的方式，来满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汽车为核心的“美国梦”。或者，就必须对能源消费以及对外贸易实行计划管理，优先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需要以及整个国家的基本战略利益。同时，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大力发展电气化的公共交通并建设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第三，2020年以后，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到 2-3%。假设折旧率为 5%、产出资本率为 0.35，则可持续的投资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23%。与现在的投资率 45%相比，要将投资率减少 20 个百分点以上，中国资本家的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就需要减少 20 个百分点以上（相当于中国资产阶级现有收入的一半至三分之二）。这将是中国资产阶级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哪个政权能够迫使中国资产阶级让出自己常年收入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哪个政权就能掌握克服中国经济未来危机的钥匙。如何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做不到割资产阶级自己的肉（而且要大割特割），那么，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以后，便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资格解决中国未来的危机。

### 薄熙来事件的历史意义

习李日暮途穷，企图用迫害薄熙来、审判薄熙来的办法来打击人民，这丝毫无损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相反，这预示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治上活跃的阶级主要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俗称小资、白领、中产等）以及无产阶级中的“老工人”（即无产阶级中与社会主义历史有联系的部分）。无产阶级中的“新工人”（即无产阶级中与社会主义历史没有联系或联系很少的部分）以及主要在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俗称“农民”）目前在政治上不活跃或不很活跃。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泛左派力量（包括马列毛左派与民族主义左派）有了很大增长。中国泛左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原国企老工人及其家属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

在一个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往往同时受到帝国主义（通过跨国资本）、本国资本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于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支持本国政府实行比较“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来提高本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改善本集团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而往往采取民族主义的或“左翼”的政治立场。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通常是与跨国资本有较为密切联系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则幻想通过向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靠拢，实行全面“开放”、即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来减少资产阶级政府对本集团的压迫，从而改善本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往往构成亲西方、亲美帝的小资产阶级右翼；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即全面私有化、买办化的前提下，实现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



“自由民主”。

在中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广大廉价劳动力，一度大大提高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综合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因而出现了一批“强国派”、“自干五”小资产阶级。他们幻想依靠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线，只要中国能够继续无限制地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就能够实现“强国梦”，甚至挑战美帝的霸权地位。这些小资产阶级构成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直到不久以前，小资产阶级中间派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最忠实、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因为薄熙来事件，这个基础无可挽回地瓦解了。

在薄熙来被审判、被迫害以后，中国的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与“改革开放”成为同义语）的各阶级、各种政治派别的联盟就初步形成了。这个联盟，首先包括无产阶级中的“老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现在正在大量地加入这个联盟。小资产阶级右翼中的少数，也开始加入这个联盟（表现为参加“挺薄”斗争）。

这个联盟所反对的，是以大官僚买办资本家为主体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目前，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主体）还在有条件地支持现政权。这个条件，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即坚持新自由主义以及向美帝投降不动摇）并且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时期实行“政治改革”（即承认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地位）。

目前，中国的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占着优势。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些优势都是暂时的，并且正在迅速丧失。

一旦中国爆发重大的经济危机，目前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无产阶级中的“新工人”以及农村“半无产阶级”）就将在政治上全面觉醒并且投入战斗。一旦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全面投入战斗，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大多数构成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联盟就将在政治上取得全面的优势。

## 未来革命的形式

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是在无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主体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

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条件下爆发的。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至少在初期，无产阶级将不掌握军队或武装力量。

因此，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既不是走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持久人民战争）也不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武装起义）。

有的同志和朋友认为，未来的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消灭“封建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问题，因而主张“左右合作”，首先打倒“权贵”。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权是“封建专制”，这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民未来要打倒的，也不仅仅是“权贵”，而是整个资产阶级。

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暂且不论，主张“宪政民主”的朋友们忽视了一个起码的问题。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只有在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已经掌握了压迫反动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权力的情况下，才能有无产阶级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迫使资产阶级做出相当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又不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的情况下，才能有资产阶级民主。如上述各节所论述的，这种妥协的空间对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十分狭窄的；因而在各对抗阶级之间，哪怕是微小的政治错误，也会导致妥协破裂。重庆改良的失败便是一个例子。

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说“县官不如现管”。翻译成学者们能够理解的话，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是要用实际的权力来保障的。只有掌握了“现管”，才能有县级的“民主”和“宪政”。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不能靠资产阶级政府包办代替，而只能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未来的中国革命将要借鉴巴黎公社、苏维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1989（形式而非内容）、阿拉伯之春（形式而非内容）等历次中外革命运动的经验。

一旦中国资本主义爆发重大的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将是大批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由于财政收入下降，各级资产阶级政府将大幅度削减各种社会支出，企图将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也就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工人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将成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普遍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城市将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各中小城市将爆发骚

乱和起义。在其中一些城市，群众将在事实上夺取当地政权，并成立类似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左派的任务是，积极参加未来的革命高潮，争取领导地方的群众斗争，并在若干地方的革命政权中占优势。

在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产阶级政府将陷入相当的混乱。这个时候，为了麻痹革命群众、争取喘息时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一定会效仿俄国 1905 年革命中的沙皇、埃及“茉莉花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军队，许诺实行全面“政治改革”，甚至愿意举行所谓“公正、自由”的大选。资产阶级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时间，在人民革命运动高潮退却以后，就杀一个回马枪，将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中国和外国的大量历史经验证明，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针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策略，马列毛左派的基本策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政治阴谋，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使革命一刻也不停顿地向前发展，一刻也不停顿地削弱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直至资产阶级缴械投降为止。

马列毛左派的具体策略，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召开没有汉奸买办卖国贼分子参加的，能够代表全国各进步阶级、各进步党派、各进步社会团体的，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由该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临时的全国民主政府、制定新宪法并根据新宪法产生正式的全国民主政府。

二．在一切地方、一切行业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参与、领导一切工人、农民、职员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以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使有利利润的资本家破产，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混乱，减少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在一切地方，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参与、领导各进步阶级反对独裁、反对“权贵”、要求民主、要求革命的斗争，并且努力将这种斗争引导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四．在一切群众已经初步掌握政权的地方，清算非法私有化，镇压黑社会以及与黑社会相联系的黑资本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迅即地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

五．在一切地方，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参与、领导一切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且通过扩大这种运动，来达到彻底破坏东亚资本主义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退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

六. 坚决发动、组织、依靠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与民主最有力、最可靠的保障。要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公社没有没收和接管法兰西银行，如果公社这样做了，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就会向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公社谈判。如果能够将煤炭、石油、电力、铁路等几个关键行业的无产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革命和民主就将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资产阶级政府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用军队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只要几个关键行业的无产阶级发起总罢工，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就会软弱下来并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与无产阶级妥协。

（撰稿人：远航一号）

## 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作者：黑夜里的牛（2013年10月21日）

原编者按：本文来自少年中国评论网站，将其转贴在此，供红中网友阅读评论。

远航一号评：该文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通篇散布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将所谓政治自由作为工人阶级是否强大的标尺，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优点和特点，也否认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反映的是一小撮小资产阶级左派青年狭隘宗派的观点。

中国左翼运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期。社会主义回归的预言落空之后，左翼改良主义在中国最先进的一批青年人中正逐渐丧失影响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被不少青年所接受。现在，革命左翼讨论的焦点已经从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执政党阶级属性的判定，转移到工人运动发展阶段、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关系、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行动等问题上来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左翼开始摆脱改良派的思想束缚，这是十几年来中国左翼运动最可喜的进展；另一方面，认识到改良主义错误的社会主义者，又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没有对社会、工人运动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从而也未能提出系统的长期斗争计划的情况下，仅仅凭着革命的热情，甚至是在完全错误的形势判断的指导下，就匆匆投入了战斗。这样的斗争也许会因为战士的坚强和献身精神取得一些暂时的成绩，博得工人和左翼知识界的同情，吸引一批又一批青年投身进去。但是，像社会主义这种需要彻底改变阶级关系的伟大社会运动，是不可能以这种原始和粗糙的方式取得胜利的。革命导师尤其是列宁已经深入详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共运的历史也充分表明了忽略这个问题的危害，那就没有任何借口在行动之前，不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严肃的思考。

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工人运动、经济形势、政治思想环境和左翼力量等重大问题形成客观判断。首先，当前的工人运动才刚刚起步，发展非常不充分。罢工事件虽然时有发生，但工人组织的建立却非常困难，而工人如果没有组织，就很难不断积累斗争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很多同志在工人运动方面估计过于乐观，存在过度美化工人运动水平的问题。不少人看到了工人运动相对前几年的发展，却没有参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历史，认识到工人运动还只是处于工联斗争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同志把工人的斗争性跟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做对比，发现工人虽然没有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却敢于跟资本家做斗争，而自己尽管满脑子革命幻想，却还未“真刀真枪”跟资

产阶级干过。于是认为工人觉悟高，工人运动的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有这样想法的青年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阅读工人运动史。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无论左派右派，其中都有相当部分人倾向于唱衰。之所以唱衰，是因为他们比较希望出现经济问题，而恶化的经济形势所造成的动荡将有利于社会变革。但是，经济形势是客观的，决不会主动去符合我们的期望。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建构在主观现象的基础上，就一定会遭到现实的惩罚，导致悲剧性的失败。社会主义者尤其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于危机前的确不妙，但在全球哀鸿遍野的衰败情景的对比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等指标都是非常乐观的。而且，随着中国在相当多的行业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对印度东南亚国家又仍然保持着优势，因此顺利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并且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第一工业强国迈进。许多严谨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将持续多年。

有些同志可能不太同意我们的判断，而他们反对的真实理由往往是高速的经济发展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工业高涨时期工人不害怕丢失工作，反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虽然这种斗争不会直接表现为对制度的否定，但自发运动的高涨是自觉斗争得以发展的前提。有些同志机械地看待危机和革命的关系，以为只要经济形势一差，马上会有革命运动。实际上，危机可能会导致革命，也可能只会带来骚乱和抗议。如果没有广泛地能够把工人阶级力量团结起来的组织，危机带来的也许只是旁观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有一些人宣扬“三五年（或七八年）就要天下大乱，革命形势就要到来的”，不知道他们仅仅是为了激发青年们革命幻想，还是其他什么目的。要知道，某改良派大师在零六年的时候就预测了几年之后将发生社会主义回归。他猜中了开始，却猜不中结局。青年们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学会独立思考，要学会拒绝简单的结论，必须要求将结论置于严谨的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之上。

关于政治改革，自由派比左派更着急，甚至有点望眼欲穿的感觉。但中国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仍然只是在纸上，在现实中，政治自由还是一句空话。而没有政治自由，工人运动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阻碍，社会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也受到很大阻碍。有些同志认为，现在的政治已经很自由，因为“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少自由”，自由不是白送来的。即便在欧洲，你没有力量就不会有政治自由。但政治自由的实现就意味着，被统治阶级强大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通过具体的力量展示来获得一时的自由，而要求与统治者定义规则，把这种斗争带来的自由固定下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很强大，所以争取到了几十人的罢工

与几万人的罢工一样，都不会遭到警察野蛮镇压的自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未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至于思想方面，“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就代表着一种严重的矛盾和分裂。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造成了“新三座大山”、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别，对工人阶级的高强度的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这些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其实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宣传的。但当局对社会主义旗帜的霸占，使得人民群众普遍反感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非常流行，加上中国的教育极大地阻碍了学生思想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这些因素都造成青年中严肃地关心政治的都很少，更不用说认同马克思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者在拥有理论自信的同时，必须充分估计到舆论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

有的同志会觉得以上的形势判断非常悲观，其实，更悲观的是我们对左翼力量的估计。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还不够高涨，发展程度不够，但这样的自发运动也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觉的社会主义群体的发展水平。左翼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其中真正愿意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出钱出力，甚至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绝对是少数。以社会主义者当前的规模，尚不足以承担提高一个地区工人运动水平的任务，更不用说推动工人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发展。这是我们考虑行动计划的起点。只有客观估计社会主义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能够完成的任务，才是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而不顾自身力量大小，提出一些非常远大的目标，这样做除了让自己和受自己鼓舞的人感到很快乐很有生活的激情之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运动的不发展带来了列宁所说的“手工业方式”的流行。在泛左翼全国性组织由于感召力下降而失去了对左翼运动的控制之后，各种小团体就流行了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小团体不仅没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为当前的革命指出一条路来，即便说实际工作方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同时，小团体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在列宁的时代，由于秘密工作和通信技术不发达，小团体间联系很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存在，这就造成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组织的缺乏。而今天小团体间的交流障碍，往往不是通信技术的不发达或者地理隔离，而是由于缺乏宽广的视野造成的小团体意识，人为地阻隔了当前最缺乏的严肃理论交流。尽管小团体意识的存在也有其客观基础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小团体意识过于强烈，把小团体的利益放在整个运动之上，那就必然对社会主义者未来的联合造成阻碍。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但无产阶级是一个又一个无产者个体，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某种身份认同，更标志

着整个雇佣劳动者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群众组织是联系无产阶级个体与整体的第一个环节。但专制国家的群众组织如果带有较强的政治性，也会像反对派组织一样，受到打压。所以，群众组织要么变成秘密组织以保持政治性，要么维持广泛地联系和影响却失去政治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把原本需要形式上广泛的群众完成的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分离出来，由主要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完成。很多人觉得讨论组织是危险的，但运动如果发展，就必然提出组织的问题。而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越是发展，对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的需要就越是强烈。真正能够避免危险的，就是建立能够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的行动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

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绝不是脱离广泛的群众组织而单独起作用的小团体。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的功能就是组织和协调各个受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群众组织、潜伏在其他阶层中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社会主义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汇集他们的作用，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这样的组织，群众组织就不能超出自身的狭隘性，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就不能一直向着最终解放的方向发力；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不能使得愿意彻底投身而且也适合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能够脱离谋生的劳动，专门地做政治工作，也就不能提高和集中自发运动中的自觉因素；没有这样的组织，分散在各个阶层中的社会主义者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群众就没法把自己当前的斗争与最终的理想联系起来，就会丧失斗志，甚至放弃理想。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组织小或者没有组织首先还是因为人少。列宁在《怎么办？》里谈到组织工作时说，当时“没有人，而人有很多”。他指的是愿意反抗现存制度的人很多，但同时“又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开始高涨，建立独立工人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运动的自觉方面而言，不仅缺乏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而且缺乏构成这种组织的材料。所以，我们是“没有人，还是没有”。既缺乏“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也缺乏能够把这些人的力量组织起来的人。而且，后一部分人相对于前一部分人来说，仍然过少。我们都承认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出现和坚强的核心组织的建立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但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直接去建立核心组织。在左翼自身力量非常弱小，亟需壮大队伍的时候，应该着眼于革命家团体的发展，从资产阶级控制最弱的地方入手，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当前工作的首要位置，不仅因为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善于做组织工作，更是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往往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是人民群众中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



义思想的一部分。只有左翼壮大了，其中愿意投身革命事业的人才会多起来，同情并且愿意帮助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才会多起来，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也就有可能建立起来。有的同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己应该跑到工人中去当一个普通工人，把自己锻炼为一个普通的鼓动家，甚至只是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这样的同志也许是真诚的，但事业不仅需要真诚的人，更需要能够想到如何把事情做成的人。

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工作不仅在当前是急迫的，实际上，到革命胜利前，它都一直会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因此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长远的眼光，长期的计划。群众工作是组织工作的基础，只有坚持在群众中扎根斗争，才会有机会影响大批有才干的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肯定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同志们在倾吐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杂志报纸、书籍、影视作品、或者老师同学在自己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对个人来说，这些作品就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接受它也许是巧合，但它的存在却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人和物都是前人奋斗的结果，是更早的运动传统的延续。这也就是葛兰西的所谓“阵地战”的精髓。斗争的要点就是占领阵地。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都应该是我们占领的地方。除了占领已有的阵地，我们还要创造据点，要到所有劳动群众那里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在运动初期应该首先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去建立组织。群众组织决不是小一些政治组织，不能弄成秘密的团体。群众组织必须尽量广泛，要变成接地气的有吸引力的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群众和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现在很多左翼社团把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志向远大，色彩鲜明，而不太顾及群众的一般政治思想状况，忽视了把社会主义和周边（在吸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的群众联系起来的任务。错误的定位导致许多左翼学生社团既没有起到群众组织的作用，也更不可能去完成政治团体的目标。

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宣传进步思想。但宣传不是忽悠，社会主义者在群众中活动的时候，也一定要坚持理性客观的精神，以真诚的态度与群众交流，通过对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等方式，逐步在群众中普及社会主义思想。这就要求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具备基本的理论素养。许多同志抱怨学了理论没什么用，号称“理论不需要太多，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观点在左翼学生中的流行颇让人担忧。今日的工人已经不是解放前农民，已经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者如果想要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就必须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科学知识。否则，不仅不能说服群众，遇到新变化新现象的时候，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学习科学知识就必须抱着严谨的态度，毛主席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需要提醒一句，有

的同志也许不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而是没有动脑筋想过运动要取得成功到底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些什么？对这部分同志，我们建议好好思考下这类问题。如果自己不属于那种愿意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来的人，就不要勉强自己。立足于当地，业余从事一些群众性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组织提供一些支持，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斗争必须讲求策略。选择阵地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明确应该到哪里去斗争。以工人运动为例，应该是到工作场地去斗争，还是到工人社区去做工作？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工厂里上班的工人和工作之后的工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又不是。对于工人自己来说，自然是；但对资本家来说，就不是了。所以，社会主义者在社区做工作，招致资本家的反感会少一些，也能够建立与工人的联系；而如果在工厂里斗争，则是跑到资本家的老窝去闹事，自然会遭致最强烈的打压。社会主义运动最终肯定在工作场所全面展开，但在运动初期，弱势的一方应该先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缺乏政治意识的地方往往会忽视的地方。把有限的力量投入到攻坚战，往往徒劳无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社会主义分子在工人社区活动会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而立足工厂内部的工运工作难见成效。学生工作也是如此。如果哪个社团采取了搞罢课等会破坏教学秩序的斗争方式，就往往会受到校方的清算，而通过学生课余生活的类似课外兴趣小组的文化活动来传播进步思想，则不会引起太多注意。这种斗争的辩证法是普遍适用的。

社会主义者自然必须密切组织工人运动的动向，尽可能地介入其中。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社会主义者应该在整个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而不论整个社会主义者的出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首先，工人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获得生活条件的改善，能想到的就是团结起来进行经济斗争。作为商品的雇佣劳动者以厂为单位，随后走向整个行业范围内的斗争，这一工联斗争的发展进程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不论这一斗争中有多少血泪，多少歌者诗人参与其中，或者多少学生扔掉学生证或者毕业证跑到工人中进行斗争的鼓动，工联斗争从整体上讲仍然必须被视为自发。而这种自发性恰好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体现——不是群众突然想要在人间建立天国，也不是读了《资本论》发现被剥削了不爽，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走向与资产阶级对抗的组织化的斗争。资产阶级无法阻止这一运动，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拖延、分散和削弱其政治性。所以，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加速这一过程，并尽力提高运动的自觉水平。无产阶级的数量是远远多于包括本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数量的，这也是唯物主义规律的体现。所以，社会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直接去组织一般的工人，而是尽量发现、培养和保护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鼓动家和活动家。这些有斗争经验的工人就是运动最先进的部分。而

要发现这样的工人，首先就要求社会主义者能够参与到与工人阶级有广泛联系的群众组织，或者是从事诸如劳动维权之类的能够辐射较大人群的工作。卖掉公司卖掉房子跑到一个一般的工厂里去干每天 11 个小时的活，做得好也许能把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斗争。但在你斗争的时候，也许同一个区的另一个厂就有工人活动家组织了比你成功得多的罢工，而这位工人如果没能得到照顾和培养，就往往会丢了工作，整日为生计发愁。如果工人的自发运动高涨，这样的工人决不会是少数。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是自己去完成一个普通的工人活动家就能完成的事情，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去做普通工人完成不了的事情：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化（而不会为了生计每天工作 11 小时），培养其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等等。坦率地说，以目前的左翼分子数量来看，即便都有超强的群众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沿海工业区去也是石沉大海，翻不起一点波浪。当年恩格斯考虑到他和马克思都没收入，而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才干要胜过自己，便放弃专门的理论和政治工作，去曼彻斯特谋取了一份枯燥的能挣钱的职位。如果进入工厂的社会主义者发现到自己的鼓动能力可能不如先进工人的时候，也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高工资的工作，然后省吃俭用地把工资剩下来给这些工人鼓动家，让他们可以成为职业活动家。现实的实力对比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地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而不是任由内心的激情压抑理性的判断。当然，在工人鼓动和组织方面有才能的同志，是可以也应该直接投身于工人运动的，而社会主义者的核心组织的大力支持会让这种介入持久并产生可以积累下来的影响。

运动的不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者时而消极时而亢奋。左翼学生不知道跟同学随便谈谈“国企改革问题”有什么价值，不知道阅读理论有什么价值，也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能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并非庸人自扰，很多毕业后的前左翼学生的确是在这种茫然状态中消极，然后慢慢淡出。于是，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想做一些跟工人有关的事情。别的事情不靠谱，工人的事情总是有价值的吧。毕竟沾了“工人”两个字，似乎就离运动近了一些，也就离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近了一些。找到事情做了，于是又亢奋起来。对于这些同志，首先要肯定其立场，他们在没有找到路的情况下，还是一直努力地想要做些事情。但同时又必须指出这种方式的问题，那就是在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情况下，不努力地在研究理论和现实基础上寻求道路，而是简单地给自己一个立场的安慰。但事业要胜利，就一定要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仅仅有拳头不够，还需要大脑。缺乏理性求实的精神是当前左翼的一大通病。要把运动往前推一步，就必须克服这个毛病。离开组织，社会主义者往往会成为运动的尾巴，而不是先锋。所以必须推动核心政治积极分子的形成，在核心团体的组织下，大家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整个运动的重要作用，就不会陷入无意义的茫然之中。此

外，还必须指出一条能够看到希望的道路，而不是让大家做“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最后还必须再谈谈左翼联合的问题。左翼团体不是企业，他们的联合不是现实的“利益”；但也不像文人圈子，联合常常只是因为聊得来看着爽。左翼团体的联合应该而且只应该基于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革命。宽泛地看，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合并在一起肯定是最好的。当下的实际情况是，各个团体的政治水平差别较大，甚至在成员的构成上都有较大区别，而许多团体开始时间不长，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经过充分的理论争鸣，没有确立普遍认可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左翼即使把左翼联合作为一项急迫的事情提上日程，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联合一定是空洞的，不稳定的。但这并不是表示不应该向联合的方向发展。联合的努力必须切合实际。应该大力提倡各个团体克服小圈子意识，让大家都充分交流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充分展示，让不同的观点在理性务实的氛围之中充分碰撞。切勿乱扣帽子，把观点差异无限拔高为立场差异，把同志间的讨论变成敌对阶级间的相互攻击。刚刚接触左翼的青年人尤其应当注意这一点。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应该明确了群众组织和专业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区别和各自的作用、社会主义者介入工人运动的方式，以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重大作用。社会主义者可以很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任务：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向青年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发展工人革命家，促进全国性的社会主义者联合，以及确立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其中每一项任务都是非常浩大的，需要许多人参与。我们不是没有事情做，而是有太多事情做。问题的关键是，同志们是否做好了斗争的准备？